

# 共產黨人的道路抉擇： 蔡孝乾的「叛變」與轉變\*

林威杰\*\*

## 摘 要

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的組建，關係中共「解放」臺灣，完成中國統一的成敗。蔡孝乾在中共江西時期即已躋身高位，是唯一參與過「長征」的臺灣人，他被委以重任，擔任省工作委員會的最高領導。但他在1950年被國民黨逮捕後，竟然不重視延安時代的氣節教育，反而立即投降，搖身一變成為協助國民黨澈底摧毀臺灣地下黨的關鍵人物。蔡孝乾參加過延安的整風審幹，知道黨的忠誠教育，為什麼被捕後迅速「轉變」？這些問題是本文關注的焦點。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蔡孝乾、叛變、轉變

---

\* 本文經兩位匿名審查人、中央研究院陳永發院士與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盛差德博士提供寶貴意見，在此深表謝忱。又，本文係第66批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面上資助「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之研究」（2019M663347）階段性成果。

\*\* 上海大學歷史學系講師

## 一、前言

蔡孝乾（1908-1982）案是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撤守臺灣後，肅清匪諜案的一次重要勝利，不僅打擊了中共「解放」臺灣統一中國的設想，同時也是「反共抗俄」時期的宣傳案例。正因為蔡孝乾的「叛變」，讓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省工委會）澈底瓦解，大批共產黨人被送上刑場。相較於蔡孝乾的「變節」，一些人則是「寧死不屈」選擇「慷慨赴義」，獻身在革命的道路上。

探究省工委會失敗的種種原委，除了國際局勢的變化，氣節教育與黨內忠誠問題自然也顯得格外重要。關於革命氣節教育，周恩來（1898-1976）是這樣說：「在敵人心臟裡，危險性很大，要隨時準備應付意外事變。遇有突然事變，要有骨氣，要臨危不懼，從容鎮定，既要有為革命獻身的決心和勇氣，又要沉著冷靜，想盡一切辦法對付敵人，保存自己，爭取長期埋伏。」<sup>1</sup>至於黨內忠誠，指的是意識形態政黨在主義信仰上的路線抉擇，有了信仰才產生忠誠問題。尤其這種主義信仰，干係政黨的發展進程，那麼勢必在黨員的篩選與要求上，就會有一定程度的規範。國共兩黨皆屬於列寧式政黨，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分別代表兩黨的意識形態，這一點則有別於歐美式民主政黨。正因為如此，才會有「叛變」亦或者「轉變」問題，也才會有對於叛徒的定義。蔡孝乾在中共眼中被視為「叛徒」，而在國民黨看來則是「自首自新」的「轉變」份子。因此，首先得瞭解蔡孝乾在革命道路上的曲折，才能進一步分析他在路線抉擇上的心境。

關於蔡孝乾的研究，陳小冲在〈一個臺灣變節者的『革命』前史——蔡孝乾早期歷史探微〉，<sup>2</sup>認為蔡孝乾踏上革命開始，就不是忠貞黨員，遇事猶豫性格，為他日後的「叛變」埋下伏筆；杜繼東有三篇關於蔡孝乾的文章，內容將蔡孝乾的一生交代清楚，但並未就筆者關心的問題作任何探索。<sup>3</sup>

<sup>1</sup> 沈安娜，〈教導勉勵永記在心——憶周恩來指導我做情報工作〉，《黨的文獻》，1（北京：1998.1），頁42。

<sup>2</sup> 陳小冲，〈一個臺灣變節者的『革命』前史——蔡孝乾早期歷史探微〉，《臺灣研究集刊》，6（廈門，2017.12），頁78-85。

<sup>3</sup> 這三篇文章分別是杜繼東，〈留學上海——蔡孝乾紅白人生研究之一〉，收錄中國社會

在省工委會議題上，如林正慧的〈1950年代左翼政治案件探討——以省工委會及臺盟相關案件為中心〉、<sup>4</sup>梁正杰的〈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相關政治案件之研究（1946-1961）〉、<sup>5</sup>蔡西濱的〈中共地下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1946-1950）——以臺北市地區為研究中心〉、<sup>6</sup>王漢威的〈戰後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的組織與運作（1946-1950）〉，<sup>7</sup>以及林邑軒的〈來自彼岸的紅色浪潮：從意義中介視角重構戰後初期「省工委」的地下革命行動〉等論文。<sup>8</sup>他們分別從政治學、社會學與歷史學等層面，剖析與探究省工委會事件與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案件。

其中關於戰後臺灣白色恐怖的研究，蘇瑞鏘在〈戰後臺灣白色恐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sup>9</sup>梳理了1940年代末至1990年臺灣白色恐怖的相關檔案與研究，系統分析學界目前研究趨勢，以及研究相對薄弱之處。文中認為，以往對臺灣白色恐怖的研究多半側重著名案件與1950年代的「匪諜」案件，但欠缺對這些人物評價與轉變分析。如何站在今日視角，來看當年投身革命的共產黨人或是國民黨人的政治立場變化。兩岸的分治，也使得這些人物有著不同的歷史定位。<sup>10</sup>誠如中國大陸中共黨史學者黃道炫所言：「無論是學術化的歷史研究還是普及性的政治宣傳，一旦無視歷史具體情境中的曲折複雜，都

---

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編，《林獻堂蔣渭水——臺灣歷史人物及其時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臺海出版社，2009），頁698-723；杜繼東，〈臺共風雲——蔡孝乾紅白人生研究之二〉，收錄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主編，《日據時期臺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頁117-132；杜繼東，〈紅白之變——蔡孝乾紅白人生研究之三〉，收錄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主編，《臺灣光復六十五週年暨抗戰史實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頁37-57。

<sup>4</sup> 林正慧，〈1950年代左翼政治案件探討——以省工委會及臺盟相關案件為中心〉，《臺灣文獻》，61：1（南投，2009.3），頁395-477。

<sup>5</sup> 梁正杰，〈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相關政治案件之研究（1946-1961）〉，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sup>6</sup> 蔡西濱，〈中共地下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1946-1950）——以臺北市地區為研究中心」〉，新北：私立淡江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9。

<sup>7</sup> 王漢威，〈戰後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的組織與運作〉，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sup>8</sup> 林邑軒，〈來自彼岸的紅色浪潮：從意義中介視角重構戰後初期「省工委」的地下革命行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sup>9</sup> 蘇瑞鏘，〈戰後臺灣白色恐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26：3（臺北，2019.9），頁139-180。

<sup>10</sup> 蘇瑞鏘，〈戰後臺灣白色恐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頁162-163。

會成為準確認知的大敵。」<sup>11</sup>

省工委會案是國民黨當局瞭解中共在臺地下工作的一次契機。因為領導人蔡孝乾的「叛變」，導致中共在臺地下組織遭受嚴重打擊。日後經歷過這段時期人物的回憶或口述訪談就值得剖析。如陳英泰的《回憶——見證白色恐怖》、<sup>12</sup>顏世鴻的《青島東路三號：我的百年之憶及臺灣的荒謬年代》，<sup>13</sup>又如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等。<sup>14</sup>藍博洲的《臺共黨人的悲歌——張志忠、季滢與楊揚》針對張志忠（1910-1954）案件的相關人物做了系統性的口述訪談，<sup>15</sup>以及李敖編著的《白色恐怖述奇》裡面收錄有龔德柏（1891-1980）在獄中對張志忠的回憶。<sup>16</sup>然而在使用這些回憶或口述訪談資料的過程中，仍需要注意這些材料背後的真實性，畢竟人非聖賢，難免隱惡揚善。這也或許如中央研究院陳永發院士所言：「我認為敵對方的資料很難排除造假污衊的可能。」<sup>17</sup>不過相信只要細心比對，多少可從中找出有價值信息。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中統」歷經黨員通訊局、內政部調查局等階段，又在臺灣改組為司法行政部調查局、法務部調查局（以下簡稱調查局）。調查局核心任務是從事大陸情報工作，對內調查思想左傾人員，對外則在中國大陸等地進行組織與活動。鑒於在中國大陸時期與中共鬥爭的歷史，加上調查局曾破獲「重整後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案」，讓調查局在中共對臺地下工作研究上有了先天的優勢及話語權。1951年調查局內部出版《共匪的特務工作與保密工作》，<sup>18</sup>隨後在1952年出版了《臺灣地區對匪鬥爭

<sup>11</sup> 黃道炫，〈刀尖上的舞蹈：弱平衡下的根據地生存〉，《抗日戰爭研究》，3（北京，2017.9），頁4。

<sup>12</sup>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臺北：唐山出版社，2005）。

<sup>13</sup> 顏世鴻，《青島東路三號：我的百年之憶及臺灣的荒謬年代》（臺北：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

<sup>14</sup> 呂芳上、黃克武、許雪姬等，《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第1-3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

<sup>15</sup> 藍博洲，《臺共黨人的悲歌——張志忠、季滢與楊揚》（新北：臺灣人民出版社，2012）。

<sup>16</sup> 李敖，《白色恐怖述奇》（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1）。

<sup>17</sup> 陳永發，〈延安的「革命鴉片」毛澤東的秘密武器〉，《二十一世紀》，8月號（香港，2018.8），頁44。

<sup>18</sup> 內政部調查局編，《共匪的特務工作與保密工作》（1951.11），檔號：276/725/19121c.4，法務部調查局藏。



工作總結》、<sup>19</sup>1954年《臺灣之政治保衛工作》、<sup>20</sup>1955年《臺共叛亂史》等等。<sup>21</sup>這些材料成為國民黨當局在制訂對大陸政策的重要參考依據，不過礙於調查局屬於情治單位，一般人很難進入閱覽，這就導致內部文件在流通上有其侷限。

1953年由張大山（1912-2011，本名朱介凡）主編的《另一個戰場的勝利》，<sup>22</sup>其中收錄有蔡孝乾「自首自新」後的一些紀錄。朱介凡在當時任職於警備總司令部，負責過許多政治案件。此書雖然是用來宣傳國民黨政府對被捕共產黨員的政策，但仍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1958年9月，國家安全局將各情治機關破獲「涉共」案件加以整理，陸續編成《歷年辦理匪案彙編》，<sup>23</sup>在編輯概要便提到：「自三十八年政府遷臺以來，我各情報及治安單位，破獲肅防案件，為數不少。對於每一案件之進行偵破，均為我工作同志瀝盡心血之結晶，亦為我各情報治安單位，對匪鬥爭工作之最寶貴史料。」《歷年辦理匪案彙編》分為3輯，內容共蒐羅214件案，這為白色恐怖時期的研究提供了一手原始資料。

綜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不難發現臺灣學界在中共對臺地下工作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早年臺灣在「反攻大陸」的指引下，必須對大陸政策有所研究，而又礙於當時政治環境，導致這項任務落在中共「轉變」份子身上。政府安排這些人在情治單位進行大陸研究，但基於意識形態立場與檔案開放程度，較難有突破性的進展；第二，近年來則因為本土意識的抬頭，社會開始反思在國民黨執政期間的「國家暴力」如何迫害一般民眾，研究方向逐漸轉向對白色恐怖案件的探討。

至於中國大陸學界關於臺灣共產主義運動的研究，也大致分為兩個趨勢：第一，側重中共與臺灣共產主義運動的關聯；第二，以人物研究為焦點，如對蔡孝乾、謝雪紅、林木順等人的研究。這些研究中又以日治時期為

<sup>19</sup> 內政部調查局編，《臺灣地區對匪鬥爭工作總結》（1952），檔號：270.9/7135a/65904，法務部調查局藏。

<sup>20</sup> 內政部調查局編，《臺灣之政治保衛工作》（1954）

<sup>21</sup> 內政部調查局編，《臺共叛亂史》（1955），檔號：232.223209/725/40541-5/c.1-5，法務部調查局藏。

<sup>22</sup> 張大山主編，《另一個戰場的勝利》，（臺北：中國新聞出版公司，1953）。

<sup>23</sup> 國家安全局編，《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1-3輯（臺北：國家安全局，1959-1961）。

重點，對抗戰勝利後中共在臺灣地下工作的研究較少。這主要礙於兩岸情勢的關係，加上地下工作本身材料就較難取得，導致研究有所侷限。

以往學界對省工委會已有不少研究，但礙於材料限制，對蔡孝乾的認識有限。關於這一點學者翁佳音提到：「由於他中年以後『變節』而服務於調查局，此後即深居簡出。所以有關他的完整資料很少。」<sup>24</sup>不過近年來關於蔡孝乾檔案已陸續開放，許多過去難以取得的第一手史料，也慢慢呈現在世人眼前。例如蔡孝乾及其同黨諸人的口供自白書、審訊紀錄等。從這些檔案中多少可以窺探一位共產黨人面臨生死存亡之際，如何在主義信仰與生命的持續之間作抉擇。蔡孝乾「轉變」任職於國防部情報局匪情研究室，後更升任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副局長。<sup>25</sup>

本文回顧蔡孝乾在革命道路上的經歷，到最後為何「叛變投敵」，進而剖析他在生存與信仰產生衝突之際，如何作出抉擇。蔡孝乾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身為黨齡最資深的臺灣人，又親歷「長征」，理應是最忠誠的共產黨員。那麼，蔡孝乾為何最終選擇「背叛」革命？那些因蔡孝乾案遭到牽連的共產黨人，是否也是如此呢？國民黨政府是否也真的寬大為懷，接納了這些中共「叛徒」？這正如楊奎松提到：「研究歷史人物不能忽視歷史背景」，尤其是在中共黨史人物的研究上，「過於偏重從中共黨史的角度來認識和解讀歷史，常常忽視了中共領袖人物乃至中共黨史，其實都不過是整個中國近代史的一部分。」<sup>26</sup>為此，在歷史的大洪流中，省工委會的創建與發展可以說是蔡孝乾登上中國近代史舞臺最輝煌的時刻。但隨著省工委會的覆亡，也讓蔡孝乾歸趨沉寂。

## 二、在共產革命的道路上

蔡孝乾本名蔡乾（有一雙胞胎弟弟蔡坤，取乾坤之意），又名蔡前、鄭

<sup>24</sup> 翁佳音，〈蔡孝乾先生傳略〉，收錄胡健國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26輯（臺北縣：國史館，2003），頁505。

<sup>25</sup> 《蔡孝乾先生傳略》，入藏登錄號：1280082880001A，國史館藏。

<sup>26</sup> 楊奎松，〈研究歷史人物不能忽視歷史背景——對《周恩來傳（1898-1949）》若干史實的辯正〉，《開卷有疑——中國現代史讀書札記》（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頁137。

葆真、陳啟順、陳純真、鄧昌華，組織上又稱「老鄭」或陳先生，潛伏於阿里山時稱「老唐」。1909年生於彰化，祖父為漢文私塾老師，父親蔡塗曾任日本警察，母親於蔡孝乾16歲時病歿。幼年時在彰化花壇學習漢文一年，後入花壇鄉公學校就讀，再轉學至彰化公學校。根據遺孀馬雯鵬稱，蔡孝乾小學期間，因侍親至孝，受校長表彰，在名字中加上「孝」字，因此「蔡『孝』乾這位孝行楷模遂成為全校師生無人不知的好學生」。<sup>27</sup>他畢業後進入「臺中州教育養成所」受訓八個月，並任公學校教員。<sup>28</sup>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蔓延全球，激勵了當時在東京留學的臺灣學生，這批留學生組織團體，發行《臺灣青年》，鼓吹中國民族主義，並利用暑假返臺，在各地組織演講，而這深深激發了年輕的蔡孝乾。與此同時，林獻堂（1881-1956）、蔡培火（1889-1983）、王敏川（1889-1942）與蔣渭水（1891-1931）等人，籌組「臺灣文化協會」（以下簡稱文協）。蔡孝乾此時在彰化，經由老師施至善的介紹參加了文協。參加文協為蔡孝乾未來從事革命運動的一個重要關鍵，他也在1923年秋天隨著老師施至善一同經由日本赴上海求學。<sup>29</sup>

蔡孝乾隨後考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當時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員裡面有不少是中共黨員，亦或者是與共產黨相關人士。如瞿秋白（1899-1935）、施存統（1898-1970）、蔡和森（1895-1931）、憚代英（1895-1931）等人。<sup>30</sup>正是在這樣的薰陶之下，讓年輕的蔡孝乾思想開始左傾。1925年五卅運動的爆發，更讓他認識到當前中國的所處的困境。在蔡孝乾看來，中國在帝國主義的欺凌之下，社會各階級不過是被奴役的對象，他認為「非打破現在的生產關係，中國的改造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打破現階段的生產制度，就得依靠

<sup>27</sup> 李宣鋒、魏永竹訪問，〈當事人蔡孝乾家屬馬雯鵬暨蔡艾安訪問紀錄〉（1998.4.10），收錄李宣鋒等主編，《臺灣地區戒嚴時期五〇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二）——個案資料》（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頁62。

<sup>28</sup>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蔡孝乾自白書及供詞〉（1950.8.29），《蔡孝乾案》，檔號：A305050000C/0036/0410.9/44904440/2/001，檔案管理局藏。

<sup>29</sup>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蔡孝乾自白書及供詞〉。

<sup>30</sup> 〈私立上海大學畢業生等〉（1936-1955），《教育部》，數位典藏號：019-030203-0048，國史館藏。

「無產階級革命」，而這個改造「非靠無產階級的能力不可」。<sup>31</sup>蔡孝乾進一步提出：「中國全民族的解放，須待社會主義的實現，新中國的改造須待無產階級的勢力。」<sup>32</sup>也正是在這一年蔡孝乾加入中國共產黨，往後他便開始積極活動。1926年蔡孝乾利用暑假返臺，這時正逢國民革命軍的北伐，許多臺灣人對廣州國民政府期待頗深。這批從中國大陸返臺的青年受到民眾歡迎，蔡孝乾便受邀到各地演講，造成社會一股風潮，進而吸引不少臺灣年輕人追隨。<sup>33</sup>

為宣揚自己理念，蔡孝乾在《臺灣民報》發表了系列文章，內容談論中國革命議題，或是對婦女問題的看法。蔡孝乾認為臺灣的婦女問題，是目前社會中相當重大的議題。<sup>34</sup>他提到在臺灣社會中資本家掌握一切資源，且在日益高漲的聘金之下，那些窮苦人家的男子只能為資本家出賣自己的勞力，女子更只能將自己貞操當作商品出售。在如此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下，逼著年輕人「離開淺陋的臺灣社會，來此廣漠闊步的大陸」，同時「脫出籠中似的臺灣，來此自由天地的中華」。<sup>35</sup>從這裡不難看出，日本統治下的臺灣社會，在蔡孝乾眼中是被那些既得利益者所掌握，對比之下的中國，則因為國民革命運動的推進，似乎成為未來的一絲希望。

列寧（Lenin, 1870-1924）曾提到：「各國共產黨必須直接幫助附屬的或沒有平等權利的民族（例如愛爾蘭、美國的黑人等）和殖民地的革命運動。」<sup>36</sup>那麼在這個理念之下，身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就必須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中解放出來。於是在共產國際、日本共產黨和中共的指導下，1928年4月，由林木順（1904-1932）、謝雪紅（1901-1970）、翁澤生（1903-1939）等人籌組的「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亦稱臺灣共產黨，以下簡稱臺共）在

<sup>31</sup> 蔡孝乾，〈駁芳園君的「中國改造論」〉，《臺灣民報》（臺北），1926年12月5日，第134號第10、12-13頁。

<sup>32</sup> 蔡孝乾，〈駁芳園君的「中國改造論」〉，第134號第13頁。

<sup>33</sup>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蔡孝乾自白書及供詞〉。

<sup>34</sup> 蔡孝乾，〈從戀愛到結婚（一）〉，《臺灣民報》（臺北），1926年1月17日，第88號第12頁。

<sup>35</sup> 蔡孝乾，〈從戀愛到結婚（三）〉，《臺灣民報》（臺北），1926年2月14日，第92號第14-15頁。

<sup>36</sup> 列寧，〈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頁219。

上海正式成立。日共不僅需要領導這個新成立的政黨，並要給予思想上、組織上的各種支持。<sup>37</sup>中共中央同樣派「彭榮」指導臺共成立大會，根據謝雪紅的回憶稱：「1955年國慶節我到天安門『紅臺』觀禮時，碰到李立三，他告訴我彭榮就是彭湃。當時，李在上海，他知道彭湃曾被中央派遣去領導臺灣共產黨成立大會。」<sup>38</sup>不過，近年來有學者認為彭榮可能為任弼時（1904-1950）。<sup>39</sup>但無論是何人，這或許能說明一點，那就是臺灣的共產革命運動與中國大陸有著千絲萬縷的瓜葛。

當時蔡孝乾因為在臺籌辦《大眾時報》的出版，並沒有參與成立大會，但仍在會上被選為臺共中央委員。臺共成立之初，「黨沒有經費，在分配工作時，都要考慮利用黨員本人的家鄉或社會關係的方便」。在黨的安排下，蔡孝乾負責臺中地方的工作，繼續在新文協裡發展左派勢力。蔡孝乾利用新文協中央委員以及《大眾時報》記者等公開身分掩護，經常在彰化、臺中以及豐原一帶從事群眾工作。不過在臺共成立期間，謝雪紅等人就因為曾在上海組織臺灣學生讀書會，受到日本領事館的注意，不久便在上海公共租界遭到日本警察逮捕。她在1928年5月遭押解回臺，但旋即於6月釋放。6月中旬，臺共在臺北大橋下的淡水河畔召開了第二屆中央委員會，會議認為：「黨的存在是暴露了，不可避免地要增加我們工作上的許多困難，幸虧黨的組織並未暴露」，要求全體黨員按照第一次中委會決定開展工作。當時未能參加臺共籌備和成立大會的莊春火、蔡孝乾和洪朝宗均表示「願執行黨所分配的任務」。<sup>40</sup>雖說這幾位黨員均對開展工作計畫「沒有異議」，隨後「卻表現惶恐之至」，據謝雪紅的回憶稱：

尤其洪朝宗怕得要死，總覺得好像到哪裡都看到有人要來逮捕他；結果連同中委蔡孝乾和黨員潘欽信、謝玉鵬四人相約，先後

<sup>37</sup> 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楊翠華編，《我的半生記》（臺北：編者發行，2004），頁261-264；盧修一，《日據時代臺灣共產黨史（1928~1932）》（臺北：前衛出版社，2004），頁56。

<sup>38</sup> 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楊翠華編，《我的半生記》，頁261、265。

<sup>39</sup> 目前學界關於彭榮真實身分尚未有完整的確證，有關彭榮身分有「瞿秋白說」、「彭湃說」、「任弼時說」。王鍵則認為彭榮為任弼時說法較為可靠。王鍵，〈出席臺共成立大會的中共代表『彭榮』身分辨析〉，《北京社會科學》，4（北京，2013.7），頁53-64。

<sup>40</sup> 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楊翠華編，《我的半生記》，頁266、282。

離開臺灣跑到廈門去了。對這四個人的處理，決議給予開除黨籍，提交日共中央批准。<sup>41</sup>

關於逃離臺灣一事，蔡孝乾解釋稱是為了保存黨的有生力量，以公開職業掩護秘密身分。離臺後，蔡孝乾活動於廈門、漳州一帶，期間他與彰化女中學生劉月蟾在漳州結婚。<sup>42</sup>蔡孝乾在漳州女中以及石碼中學工作3年，負責指導臺共在閩南地區臺籍學生工作。<sup>43</sup>

1932年中共紅軍攻入漳州，蔡孝乾藉此機會和十多位臺灣學生到紅軍「第一軍團」報名參軍，在好友李文堂的引薦之下，他被分配到政治部工作。成為「紅色戰士」一員的蔡孝乾感到：「覺得我是走進了自己政治生命中的另一種新境地。」<sup>44</sup>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第二次全國蘇維埃大會在瑞金召開，蔡孝乾是唯一的臺灣代表，並在會上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此時國軍正準備展開第五次圍剿，中共在當時共產國際代表李德（Otto Braun, 1900-1974）指揮之下，採取「禦敵於國門之外」，與國軍展開正面衝突。不料仍不敵國軍優勢兵力，被迫展開「長征」。在出發之前，蔡孝乾赴醫院與劉月蟾會面，此時妻子已懷有7個月身孕，因此不克與蔡同行。<sup>45</sup>爾後蔡孝乾隨著主力部隊展開「長征」，最終於1935年11月抵達陝北。<sup>46</sup>

蔡孝乾晚年將這段「長征」的經歷撰寫成《臺灣人的長征紀錄》一書，稱「因共產主義不合中國國情，與中共本身的基本弱點，如路線、政策錯誤及其內部思想嚴重分歧等，加上強大國軍的圍剿，中共創立叛亂根據地的企圖終告澈底失敗，遂於一九三四年十月開始突圍西竄」，而本書則是「作者親身經歷那一段歷史悲劇的真實紀錄」。<sup>47</sup>但其實蔡孝乾一直對這段「長征」的經歷感到自豪，據後來負責辦理蔡孝乾案的谷正文（1910-2007）回憶，在第一眼見到蔡孝乾時的印象：「從他渾身上下所散發出來長征老幹部特有的

<sup>41</sup> 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楊翠華編，《我的半生記》，頁290。

<sup>42</sup> 蔡孝乾，《臺灣人的長征紀錄》（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2），頁1-3。

<sup>43</sup>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蔡孝乾自白書及供詞〉。

<sup>44</sup> 蔡孝乾，《臺灣人的長征紀錄》，頁9、12-17。

<sup>45</sup>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蔡孝乾自白書及供詞〉。

<sup>46</sup>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蔡孝乾自白書及供詞〉。

<sup>47</sup> 蔡孝乾，《臺灣人的長征紀錄》，頁7。

傲慢。」<sup>48</sup>

在陝北期間，蔡孝乾擔任西北抗日救國聯合會主任，後又被任命為蘇維埃政府內務部部長。不久他被派往山西任第十八集團軍總政治部敵工部部長。<sup>49</sup>在此期間，蔡孝乾專注於八路軍的宣傳工作，以及日軍議題。他善用臺灣人的身分，進行政治宣傳，以此爭取民眾對共產黨的支持。

### 三、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的創建

1945年8月抗戰勝利，臺灣成為國共競逐的目標之一。這時蔡孝乾的身分就顯得格外重要，因此中共中央決定派他回臺籌建黨組織。他接到命令後，從延安出發，歷經三個多月後到達蘇北華中局，與書記張鼎承（1898-1981）、組織部長曾山（1899-1972）、委員劉曉（1908-1988）等人討論在臺建立黨組織一事。經過兩個多月的討論，決定組成「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由蔡孝乾擔任書記，同時挑選幾位重要幹部，於1946年2月，分別由蘇北途經上海分批來臺。蔡孝乾指示洪幼樵（1916-1990）先行出發，設法以職業掩護工作，謀求立足之地。蔡孝乾本人則在上海等候國民大會的召開，逗留期間與馬惠玲結婚，隨後兩人一同來臺。蔡孝乾自1928年離開臺灣後，已有多年未曾返臺，因此對於臺灣現狀有一定程度的隔閡，也不敢去找尋以往的親朋好友，深怕身分曝光。<sup>50</sup>

當時蔡孝乾主要利用兩條管道來組織活動，第一條是透過謝雪紅的關係，以原先的臺共等基礎來發展；第二條則是設法聯絡華南一帶中共失聯黨員，這些人會講客家話或是閩南語，能儘快融入臺灣社會。<sup>51</sup>1946年7月蔡孝乾經由舊臺共關係聯絡，命令那些已經先抵臺的幹部，在穩定根基後開始組織活動。<sup>52</sup>當蔡孝乾等人在臺灣如火如荼展開活動之際，國民黨當局其實早已

<sup>48</sup> 谷正文，《國共地下鬥爭紀實：國民黨特務頭子回憶錄》（香港：東西文化事業公司，1996），頁84。

<sup>49</sup>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蔡孝乾履歷書〉（1952.9.20），《蔡孝乾案》，檔號：A305050000C/0036/0410.9/44904440/4/007，檔案管理局藏。

<sup>50</sup>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蔡孝乾自白書及供詞〉。

<sup>51</sup> 曾永賢口述，《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問錄》（臺北：國史館，2020），頁85-86。

<sup>52</sup>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蔡孝乾自白書及供詞〉。

掌握情資，據報告顯示：

中共閩臺區負責人蔡前，奉中共中央命挑選幹部四十餘人赴臺北活動。先後在臺北、基隆各處鄉間組織民主義勇軍、解放青年團、少年先鋒隊等，並在濱海各區組織海岸民眾解放聯合會議，誘惑一部日軍及日商參加武裝走私，因而獲得大量軍火與金錢。<sup>53</sup>

為此，蔣中正（1887-1975）命令時任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1883-1950），要他「注意並查報」。<sup>54</sup>1947年，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警務處將全臺各地與共產黨相關份子的基本資料、特徵性格以及在中共黨內的地位與號召力製成一完整名單，蔡孝乾即名列其中，當中尚有新竹縣縣長劉啟光（1905-1968）、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元丁（1898-1947）、省議員如林日高（1904-1955）、屏東市參議員顏石吉等政府官員。不過此時國民黨當局僅掌握蔡孝乾為「臺灣省委員會委員兼書記領導組織工作」，「已率幹部返臺積極活動」，其餘知之甚少。<sup>55</sup>省工委會在成立後，主要任務有以下幾點：

- （1）發展臺灣全省各地之黨的組織；
- （2）對臺灣同胞作秘密之政治宣傳；
- （3）蒐集臺灣境內軍事及政治之情報；
- （4）利用關係策反思想上動搖之軍政人員；
- （5）準備建立臺灣之地下武裝；
- （6）開展高山族及外省同胞工作。<sup>56</sup>

從這些目標中不難看出，中共企圖由內部開始滲透，也期望將在中國大陸根據地經驗移植到臺灣。中共指示省工委會積極在臺灣搜集情報，「進行策反

<sup>53</sup> 〈蔣中正致陳儀要求注意蔡前等人在臺活動電〉（1946.5.3），《蔣中正總統文物》，「種種不法罪行（二）」，數位典藏號：002-090300-00018-205，國史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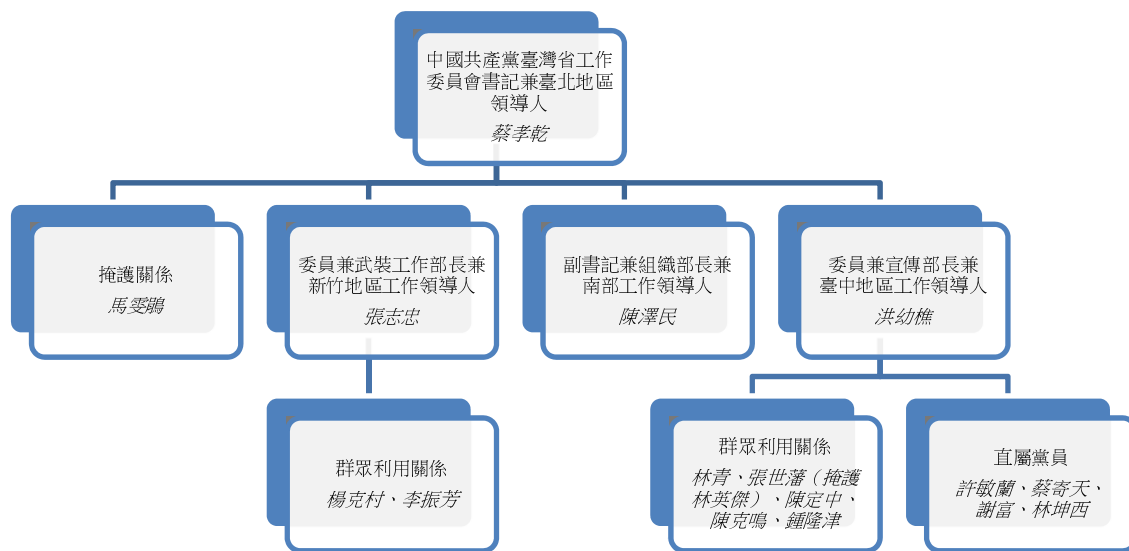
<sup>54</sup> 〈蔣中正致陳儀要求注意蔡前等人在臺活動電〉。

<sup>55</sup> 臺灣省警務處刑警總隊，《各縣市奸黨調查案》（1947.1.2-12.23），檔號：A301010000C/0036/0019/36，檔案管理局藏。

<sup>56</sup> 〈共匪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秘密組織破獲經過〉（1950.5.12），《蔣經國總統文物》，「國防部總政治部任內文件（一）」，數位典藏號：005-010100-00050-007，國史館藏；中共問題原始資料編輯委員會，《中共的特務活動（中共原始資料彙編之三）》（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3），頁343-344。



工作，對有關係之動搖份子而在我軍政機關或生產機構服務者，秘密予以口頭命令，指定其為共匪擔任工作」。<sup>57</sup>關於省工委會組織情形如圖 1 所示：



資料來源：〈破獲共匪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組織系統表〉，《蔡孝乾案》，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50000C/0036/0410.9/44904440/1/001/0021。

圖 1 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組織系統表

當中值得注意的是馬雯鵬，她是馬惠玲的妹妹，也是蔡孝乾的小姨子。馬惠玲是蔡孝乾第二任妻子，蔡孝乾在自白中交代的不少，僅提到 1946 年「在滬與繼室馬惠玲結婚，婚後協同來臺」。<sup>58</sup>馬惠玲因蔡孝乾與馬雯鵬有曖昧關係，因此與他分手，並在 1949 年夏返回中國大陸。當時年僅 14 歲的馬雯鵬便順理成章在臺灣照顧蔡孝乾生活起居，她利用自己年幼身分作掩護，從事傳遞秘密文件等工作。<sup>59</sup>蔡孝乾在往後的日子裡與小姨子馬雯鵬過從甚密，甚至成為影響到他「轉變」的重要因素之一。至於第一任妻子劉月蟾，她曾在 1928 年陪同蔡孝乾從臺灣遠赴漳州，以躲避日本政府的通緝。兩人在漳州

<sup>57</sup> 〈共匪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秘密組織破獲經過〉。

<sup>58</sup>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蔡孝乾自白書及供詞〉。

<sup>59</sup>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馬雯鵬訊問紀錄〉（1950.6.20），《蔡孝乾案》，檔號：A305050000C/0036/0410.9/44904440/2/007，檔案管理局藏。

生活3年有餘，後又與蔡孝乾赴江西瑞金。在「長征」出發前，據蔡孝乾說法：「我到『國家醫院』會見前妻劉月蟾，她那時懷妊7個月，在醫院休養，不便與我同走，就成了永遠的別離。」劉月蟾在蔡孝乾18歲時便與他結婚，且彼此同甘共苦多年。但蔡孝乾卻在即將臨盆之際將她拋下。要知道，蘇區在國民政府圍剿之下，生存環境可謂惡劣。身為共產黨員眷屬的劉月蟾，一旦落入國民黨手中，其遭遇不可想象。也許跟隨蔡孝乾共赴「長征」還有一線生存機會？而此時他卻選擇了拋妻棄子。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使中共對臺灣有了著力點，宣傳上開始聲援臺灣民眾，稱：「以和平方法爭取自治，和在蔣介石武裝進攻之下採取武裝自衛的手段，我們對此是完全同情的。你們的鬥爭就是我們的鬥爭，你們的勝利就是我們的勝利。解放區軍民必定以自己奮鬥來聲援你們，幫助你們」。<sup>60</sup>為了使「臺灣自治運動」達到勝利，中共指示省工委會必須朝六點方向努力：

- 第一，拒絕對政府妥協；
- 第二，組建與整合武裝力量；
- 第三，籌建工會與組織工人糾察隊；
- 第四，建立一套完整的政治團體；
- 第五，訓練幹部，深入農村基層；
- 第六，建立起根據地。<sup>61</sup>

同時解放軍牽制了國軍主力，「對於臺胞的壓力就會減輕」。<sup>62</sup>當時省工委會在臺灣不過70餘黨員，無法對二二八事件起實際領導，只有張志忠在中南部組織武裝力量，成立「自治聯軍」，以及由謝雪紅「率領黨徒鼓動學生組織自治軍設司令部偽造關防」，在中部積極參與武裝抗爭。<sup>63</sup>但兩股力量與國軍相較之下仍過於懸殊，因此很快遭到撲滅，張志忠無法再返回嘉義，而謝雪

<sup>60</sup> 〈臺灣自治運動〉，《解放日報》（延安），1947年3月20日，第1版。

<sup>61</sup> 〈臺灣自治運動〉，第1、2版。

<sup>62</sup> 〈臺灣自治運動〉，第1、2版。

<sup>63</sup> 〈白崇禧呈蔣中正宣慰臺灣二二八事變報告書〉（1947.4.6），《蔣中正總統文物》，「一般資料——專件（二十四）」，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378-001，國史館藏。

紅則逃離臺灣。<sup>64</sup>

1947年11月，謝雪紅在香港成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以下簡稱臺盟），由她任主席，總部設立於香港，遙控指揮在臺工作。此組織與省工委會分開，彼此不隸屬。在二二八事件後，為了能更深入發展在臺組織，蔡孝乾指示省工委會桃竹苗一帶負責人曾永賢（1924-2019）利用臺盟的名義來接觸群眾、教育群眾、發展群眾，而不是馬上提出共產黨名號。根據曾永賢的回憶稱：

那時我們的行動與謝雪紅沒有關係，僅僅借用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的名義，仍由蔡孝乾主導。所以我們只是把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當作地下黨的一個外圍組織來運用，但是運用得不是很理想。因為，一方面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的號召力不夠，另一方面大家也由於害怕而不敢信任，畢竟它不是臺灣本地的組織，而是從中國大陸過來的。<sup>65</sup>

省工委會利用謝雪紅的號召力，將臺盟作為對外宣傳之工具或吸收組織成員的外圍組織。這就是為何日後破獲由省工委會主導的相關臺盟案件中，與謝雪紅在香港的臺盟組織關聯較小。<sup>66</sup>此外，當時臺灣的地下黨，「除了蔡孝乾這個系統的組織比較全面而且具有散布各處的地下組織外，尚有一些中共情報機關個別派人來建立的組織，和蔡孝乾沒有關係」。不過這些地下組織，後來隨著國民黨政權的逐漸穩固，多半遭到破獲。<sup>67</sup>

1948年5月，劉曉在香港主持召開「臺灣工作幹部會議」。省工委會領導人蔡孝乾、洪幼樵、張志忠，以及臺盟主席謝雪紅等人參與會議。「香港會議」是省工委會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此次會議決定增派陳澤民（1909-1981）入臺負責組織工作。在蔡孝乾原先的預期之下，1949年底要發展黨員兩千人，群眾五萬人。但實際狀況受到很大的阻礙，僅發展黨員及民眾千餘人，不過這已較二二八事件前有很大的進展。在組織上則有部分變革，省工

<sup>64</sup>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蔡孝乾自白書及供詞〉。

<sup>65</sup> 曾永賢口述，《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問錄》，頁81。

<sup>66</sup> 林正慧，〈1950年代左翼政治案件探討——以省工委會及臺盟相關案件為中心〉，頁395-447。

<sup>67</sup> 曾永賢口述，《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問錄》，頁82。

委會設有組織部、宣傳部、武工部、「臺灣學生工作委員會」（轄十個支部）、「臺灣郵電職工工作委員會（轄五個支部）」、「臺灣山地工作委員會」（轄四個支部），以及有「蓬萊民族解放委員會」、「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等外圍組織。此外，省工委會直屬編制上有電臺、印刷廠、海關、警察、交通、黨報、財務、調查研究、統戰等部門。在臺灣各縣市則設有地方工作委員會，如臺北區統有臺北市、臺北市工人、基隆市、蘭陽區及北峰區工作委員會；新竹區有新竹市、海山區、桃園區、竹南區工作委員會；臺中區有臺中市、南投區及臺中區武裝工作委員會；臺南、高雄區有臺南市、高雄市、屏東區、岡山區工作委員會，以及有臺南市工作委員會書記李媽兜（1900-1953）直接領導的各支部。<sup>68</sup>

香港會議決議通過省工委會未來發展的策略，但在實際工作中卻遇到不小的阻礙。因此省工委會在執行上做了不少的修改，根據蔡孝乾的自白供稱：

- (1) 取消香港會議的「長期性工作」的決定，認為臺灣即時「解放」，各級組織應提高緊張情緒，加強工作，以迎接「解放」；
- (2) 修改香港會議的「通過民主方式的群眾運動」，認為仍以隱蔽潛伏的發展為宜；
- (3) 根據目前形勢，應加強農村的工作，修改香港會議的「城鄉並重」策略，決定幹部儘量轉入鄉村；
- (4) 對武裝工作的應否恢復問題，爭論多次無結果，但後來各地區依實際環境的需求，都建立武裝工作，至於曾決定設法打通兵運工作一事，尚無表現；
- (5) 認為國民黨推行的三七五減租運動，在臺灣今日的農村中尚帶有某些進步性，決定通過此一運動，以團結農民，提高其政治覺悟。<sup>69</sup>

從這些決議中不難看出，省工委會認為臺灣「解放」已勢在必行，而當前的主要工作就是紮根群眾，深入基層，屆時便能由內而外打擊國民黨政權。不

<sup>68</sup> 石牌訓練班編印，《共匪特工的作法》（臺北：石牌訓練班，1957），頁71-73；中共問題原始資料編輯委員會，《中共的特務活動（中共原始資料彙編之三）》，頁332-334。

<sup>69</sup>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蔡孝乾自白書及供詞〉。

少人堅信著，「解放軍就快來了，我們的犧牲有代價了」，「中共攻臺箭在弦上，拖些時候事情就會自然解決吧」。<sup>70</sup>

「過於樂觀」是省工委會在工作進展上的一個致命失誤，當時臺灣的中共地下黨員普遍有三個看法：第一，在中國大陸的有利情勢，讓不少人認為「解放臺灣」勢在必行；第二，已往工作過於順利，「如吳石之流的動搖份子幾乎不費力就可以拉攏過來」；第三，社會人心的動盪，使工作活動減少了阻礙。「這些都是足以使組織人員由樂觀而大膽，由大膽而放任，一旦遭到打擊，挽救已來不及。」<sup>71</sup>現實卻不如預期那般，省工委會並沒有迎來解放軍，反倒是蔡孝乾自己遭到國民黨逮捕，這使得省工委會發展面臨巨大的打擊與挑戰。各地區領導人亦紛紛被捕，少部分人則潛入山區伺機而動。不過這些零星的抵抗，最後多半在「重整後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案」後趨於覆滅。<sup>72</sup>

#### 四、省工委會的破獲與共產黨人的「寧死不屈」？

1949年7月上旬，中共藉由抗戰十二週年之際，發動大規模輿論宣傳攻勢。此時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已陷，在風雨飄搖之際，中共在臺「散發反動傳單，張貼反動標語，一夜之間，遍及全島，聲勢浩大，可謂空前」。<sup>73</sup>省工委會接獲中共中央的命令，動員全島各地組織，以「一切配合解放軍作戰」的號召，企圖以內外夾擊形式顛覆國民黨政權，其具體任務如下：

- (1) 在海岸港口要塞交通要點加強黨的組織發展群眾小組；
- (2) 在重要的資源和工廠中團結群眾避免「反動派」的破壞；
- (3) 利用「國民黨」的內部矛盾爭取願意悔過之任何人與團體保證他們的地位與出路；

<sup>70</sup> 沈懷玉訪問，〈江源茂先生訪問紀錄〉（1998.11.27），《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第2輯，頁549；顏世鴻，〈青島東路三號：我的百年之憶及臺灣的荒謬年代〉，頁30。

<sup>71</sup> 張大山主編，〈另一個戰場的勝利〉，頁38。

<sup>72</sup> 石牌訓練班編印，〈共匪特工的作法〉，頁73-74、84；中共問題原始資料編輯委員會，〈中共的特務活動（中共原始資料彙編之三）〉，頁334-335。

<sup>73</sup> 〈匪基隆市工作委員會鍾浩東等叛亂案〉（1949.8.23 偵破），收錄李宣鋒等主編，〈臺灣地區戒嚴時期五〇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二）——個案資料〉，頁5。

- (4) 在農村建立小型武工隊，在近山據點建立工作組，並加強高山族工作，以呼應「解放軍」的登陸阻撓敵人後方；
- (5) 在「解放軍」登陸地區加強宣傳鼓動人民帶路和出售糧食；
- (6) 抽出幹部團結群眾中的積極份子組織調查委員會準備「接管」工作。<sup>74</sup>

省工委會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儘可能建立人民武裝配合『解放軍』登陸臺灣，『解放』臺灣是目前臺灣人民的迫切課題」。<sup>75</sup>一切看似順風順水的情況下，1949年7月中旬，保密局查獲共產黨宣傳刊物《光明報》，顯示了共產黨在臺已有組織活動，內容充滿對國民黨的嘲諷。《光明報》由基隆中學校長同時也是省工委會基隆市書記鍾浩東（1915-1950）創辦。創報後便在臺北地區散發極廣，「後來竟然塞進了當時軍事強人陳誠的辦公室，甚至老總統的住處。這件事情既然驚動了最高當局，在『此退一步，即死無住所』的壓力下，案子就不能擱置不辦」。《光明報》事件讓蔣中正勃然大怒，因此下令徹查。<sup>76</sup>

《光明報》一開始便採取半公開的方式發行，「放在腳踏車後頭，載去挨家挨戶的分發。不但如此，地下黨的黨員晚上還會出來找年輕人，組織讀報會，一起討論；而分發《光明報》的人，每個禮拜還有兩次夜間集會」。但也由於缺乏秘密掩護，導致《光明報》在短時間內迅速被偵破。<sup>77</sup>保密局在抓獲四名持有《光明報》的臺大學生後，便順藤摸瓜逮捕了鍾浩東，並抓獲其餘43名涉案份子，同時查獲印刷器材等證據，幾位領導人被以「蒐集軍政情報，開展兵運工作，俾便於匪軍來犯時陣前策應，協助登陸」罪名，遭處以死刑。鍾浩東則被判「連續共同意圖以非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罪名，

<sup>74</sup> 國防部保密局印，《搜獲共匪臺灣省工作委員會重要秘密文件之六：怎樣配合解放軍作戰》（1950.5），檔號：257.4/7451n.6；c.2/08286，法務部調查局藏，頁1。

<sup>75</sup> 國防部保密局印，《搜獲共匪臺灣省工作委員會重要秘密文件之四：怎樣建立臺灣人民的游擊武裝》（1950.5），檔號：257.4/4155，c1/08281，法務部調查局藏，頁1。

<sup>76</sup> 振雄，〈葉翔之將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連根拔起〉，收錄中華民國忠義同志會，《大略雄才——葉翔之先生百齡冥誕紀念集》（臺北：中華民國忠義同志會，2011），頁27。

<sup>77</sup> 曾永賢口述，《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問錄》，頁85。

被判以死刑。<sup>78</sup>

保密局在審訊鍾浩東時，得知「老鄭」這號人物，這引起負責此案谷正文的興趣。不久保密局又破獲省工委會高雄地區組織，逮捕了書記陳澤民，谷正文又從陳澤民筆記中看到「老鄭」這號人物，從中套出「老鄭」在臺北市泉州街26號其中一個住所。在晝夜埋伏之下，最終在1950年1月順利將這位「老鄭」逮捕歸案。<sup>79</sup>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在臺北被捕，但不久卻趁亂潛逃。在逃往多日後，蔡孝乾在4月27日在嘉義竹崎鄉再度遭捕獲。<sup>80</sup>

這時蔡孝乾選擇投靠國民黨，主要是因為他相信「感訓」，認為「自首自新」能讓自己有條活路，根據曾經參與過「臺灣學生工作委員會」顏世鴻（1927-）的回憶：「蔡孝乾當時也許相信（什麼程度就難說），可能以感化處理。因為四月被捕以前，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還在內湖。而洪幼樵記性好，每個支部多少人都記住了，因此害慘了那些中下幹部。」當時省工委會不少中級幹部也相信蔡孝乾所說：「只要受三個月的感訓，因此短短一個多月，大半的地下組織都一一被破壞了。」<sup>81</sup>不過蔡孝乾身為資深共產黨員，歷經過中共黨內階級鬥爭，參與過「長征」，這樣的人應該有充分的鬥爭經驗與對國民黨的認識才是，「當然有此錯覺真是不可思議，使人懷疑只是做為出賣別人的藉口。更恐怖的是這種大錯不限於最高上級的蔡，而普遍地存在於次高的以及再次高、次次高的所有階級幹部」。另一位白色恐怖受害者陳英泰（1928-2010）是這樣回憶：「多數蔡洪手下的市委幹部、學委幹部也都在他們的說服下如法炮製地把整個組織都交出來。整個組織垮了，被抓的抓、自首的自首、跑路的跑路，但跑路的也只是短暫時間，最後若不出來自首就被捕殺了。」<sup>82</sup>

顯然的，蔡孝乾忘記身為共產黨人的基本準則，「自首自新是黨的污

<sup>78</sup>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鍾浩東等匪諜案卷〉（1950.9.9），《鍾浩東等叛亂》，檔號：A305440000C/0039/273.4/481，檔案管理局藏。

<sup>79</sup> 谷正文，《國共地下鬥爭紀實：國民黨特務頭子回憶錄》，頁74、79、82-85。

<sup>80</sup> 〈共匪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委員四人之略歷〉（1950.5.12），《蔣經國總統文物》，「國防部總政治部任內文件（一）」，數位典藏號：005-010100-00050-007，國史館藏。

<sup>81</sup> 顏世鴻，《青島東路三號：我的百年之憶及臺灣的荒謬年代》，頁146-147、211。

<sup>82</sup>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上冊，頁79。

點，是最可恥的現象」。<sup>83</sup> 保密局對蔡孝乾「運用優待與說服等方式，使其樂於提供組織關係，致得以澈底偵破」。<sup>84</sup> 國民黨政府按照蔡孝乾等人所提供的線索按圖索驥，使潛伏在臺的共產黨員一一浮現，例如保密局在1950年2月5日偵破「臺灣省工委會郵電總支部計梅真等人案」，將計梅真、錢靜芝等35人，分別處以死刑及有期徒刑。又如朱謙之（1905-1950）、吳石（1894-1950）案。

### （一）臺灣省工委會郵電總支部計梅真等人案

臺灣光復初期，由於長期受到日本的殖民統治，文化的差異讓本省籍人士與中國大陸來臺的外省籍人士產生不少矛盾。加上戰後日本技術人才大多遭到遣返，導致社會運作出現停擺危機。為解決這樣的現象，一些外省籍政府官員利用私人裙帶關係，將自己親朋好友安插在各崗位上。但這也造成臺灣本省籍人士在就業上的困難，加劇了省籍的對立。<sup>85</sup> 加上當時臺灣人普遍僅會說臺語與日語，為了改善現況，唯一希望就是「趕快學會國語，儘早通過『改班考試』」。<sup>86</sup> 計梅真與錢靜芝等人就利用擔任臺灣郵務公會國語補習班教員的機會從事活動，其主要工作如下：

組織同學會、姊妹會（又名親睦會）。討論青年、國際及婦女等問題，灌輸左傾思想；亦乘機進行課外之登山、唱歌、游泳、出版刊物，與各種群眾之公開外圍活動；從事吸收匪徒。及利用匪幹部潛伏於郵電部門之勢力，煽動群眾發起要求改班借薪與提高待遇之各種運動。並鼓勵匪幹競選工會理事，意為活動之掩護，及爭取幹部與群眾之好感，以廣收匪徒廣大叛亂組織。<sup>87</sup>

<sup>83</sup> 閩粵贛邊省委編，《關於自首自新決定的通知》（1937.10.15），檔號：245.3/815/12626，法務部調查局藏。

<sup>84</sup> 〈匪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叛亂案〉（1949.10.31 -1950.2.16 偵破），收錄李宣鋒等主編，《臺灣地區戒嚴時期五〇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二）——個案資料》，頁61。

<sup>85</sup> 張若彤，《究竟228：林茂生之死與戰後臺灣反日力量的覆滅》（臺北：講台文化有限公司，2021），頁71-85。

<sup>86</sup> 陳文達訪問，〈臺灣省工委會郵電總支部計梅真等人案：李煒臺訪談紀錄〉（1996.8.25 訪問），收錄李宣鋒等主編，《臺灣地區戒嚴時期五〇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二）——個案資料》，頁114。

<sup>87</sup> 〈匪臺灣省工委會郵電總支部計梅真等叛亂案〉（1950.2.5 偵破），收錄李宣鋒等主編，



保密局為了讓計梅真供出組織網，以及學生名單，「用了各種酷刑，計老師沒有辦法才和保密局的人簽了協議書，要保密局保證不抓這些學生和保障學生的生命才交出學生名單。」<sup>88</sup>據當時被捕入獄的學生周淑貞提到：

在牢裡有幾次碰到老師時我都想問她究竟我是做了甚麼事才會被抓的，但是每次看到老師那樣沉重自責的心情，我就問不出口來。到後來我才理解到老師那樣做，其實目的還是在於保護我們。因為她如果是貪生怕死的話，後來有免她一死的機會，聽說計老師和補習班的事是蔡孝乾（坐牢才聽到這名字）交出來的。後來特務就告訴計老師說她只交了那些學生沒有用，如果交出一些她所認識的大人物可以像蔡孝乾那樣免死，她都拒絕了。她說她已錯過一次毀了那麼多學生的前途，她不能再錯，否則抱憾終身遺臭萬年。<sup>89</sup>

但計梅真與錢靜芝仍被以「共同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的罪名，遭判處死刑以及褫奪公權終身。<sup>90</sup>在行刑前，「計老師就說：『還好，只有我們兩個人。』這是她最後的一句話，其他沒有留下任何遺言。可見一直到死前她最擔心的還是學生的生死問題，因此如同卸下心頭上的一塊大石頭一般地在臨死前說出那句話，然後鎮定地走出去」。<sup>91</sup>

## （二）朱謙之、吳石案

另根據蔡孝乾供詞所述，「發現有重要女匪幹朱謙之，係由香港奉匪方

---

《臺灣地區戒嚴時期五〇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二）——個案資料》，頁98。

<sup>88</sup> 陳文達訪問，〈臺灣省工委會郵電總支部計梅真等人案：周淑貞訪談紀錄〉（1996.8.25訪問），收錄李宣鋒等主編，《臺灣地區戒嚴時期五〇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二）——個案資料》，頁129。

<sup>89</sup> 陳文達訪問，〈臺灣省工委會郵電總支部計梅真等人案：周淑貞訪談紀錄〉（1996.8.25訪問），收錄李宣鋒等主編，《臺灣地區戒嚴時期五〇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二）——個案資料》，頁129-130。

<sup>90</sup>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1950.9.7），收錄李宣鋒等主編，《臺灣地區戒嚴時期五〇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二）——個案資料》，頁106。

<sup>91</sup> 陳文達訪問，〈臺灣省工委會郵電總支部計梅真等人案：周淑貞訪談紀錄〉（1996.8.25訪問），收錄李宣鋒等主編，《臺灣地區戒嚴時期五〇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二）——個案資料》，頁130。

命令來臺潛伏，擔任蒐集情報及聯絡工作」。保密局依循此線索展開調查，最終於 1950 年 2 月 26 日將朱諶之由浙江定海押解回臺。朱諶之在被捕瞬間，「服用大量黃金自殺，經實施緊急政治〔治療〕，始獲保全生命，旋即一面予以療養優待，一面進行政治說服，幾經嚴密研訊，卒始供認所擔任之重要任務」。保密局依據朱諶之供詞，循線逮捕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sup>92</sup>朱諶之在臺任務是負責與吳石聯絡，關於她主要工作內容如下：

朱諶之係浙江鎮海人，夫家姓陳，早寡。於民國卅六年加入匪黨，原在共匪華東局經濟部工作，奉派來臺後，每週與吳石聯絡一次兩次，將吳石所供給之情報轉送共匪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至本年二月六日，朱諶之因臺灣共匪組織破壞之威脅，由蔡孝乾通知其離臺，乃飛赴定海，經本部保密局電飭定海工作人員偵查，卒於二月十八日在沈家門就捕，於二月廿六日押解來臺，供認上情不諱。<sup>93</sup>

3 月 2 日，當朱諶之獲悉吳石被捕時，曾在紙上寫道：「整宵失眠，頭昏腦脹，為吳事精神不堪負荷，今始知良心之制裁，尤較法律制裁為苦也。」這讓辦理此案的保密局幹員感到：「朱匪尚未喪盡天良。」<sup>94</sup>

至於吳石，他身為國軍中將，手中掌握國民黨軍事機要。1949 年 4 月，在解放軍渡過長江後，吳石曾向中共地下黨吳仲禧（1895-1983）提供兩份國軍的情報資料。據吳仲禧的回憶稱：「一是國民黨部隊留置西北的部隊番號、駐軍地點、部隊長的姓名以及殘餘部隊的人員和力量。二是國民黨部隊在長江以南沒有被消滅的，還在川、滇、湘、粵邊境的部隊準備整編的計劃。」<sup>95</sup>而這也加速了中共在中國大陸軍事推進的過程。

<sup>92</sup> 〈吳石等人案〉（1950.2.18 偵破），收錄李宣鋒等主編，《臺灣地區戒嚴時期五〇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二）——個案資料》，頁143。

<sup>93</sup> 〈前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通匪叛國案破獲情形〉（1950.5.12），《蔣經國總統文物》，「國防部總政治部任內文件（一）」，數位典藏號：005-010100-00050-007，國史館藏。

<sup>94</sup> 〈吳石等人案〉，收錄李宣鋒等主編，《臺灣地區戒嚴時期五〇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二）——個案資料》，頁143。

<sup>95</sup> 吳仲禧，〈解放戰爭時期我與吳石的交往〉，收錄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170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7），頁84-85。

在共產黨觀念中，身為一位馬克思主義信仰者，面對生死關頭時，理應「從容不迫」，「慷慨赴義」。吳石就曾向審判長蔣鼎文（1895-1974）請求，希望獲得寬恕減刑。據保密局局長毛人鳳（1898-1956）所呈報告顯示：

吳石扣押後對勾結共匪供給軍事情報均坦白供認，並根據其口供及搜獲之證據，繼續逮捕有關共犯，計前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部中將總監陳寶倉，以及方克華、江愛訓、林志森、王濟甫、聶曦、王正均等多人，或協助吳石蒐集情報或代吳石傳遞文件，或將職務上保管之密件供給吳石俱各供認不諱。<sup>96</sup>

2013年10月，北京西山落成一座「無名英雄紀念廣場」，裡面有四座令人矚目的雕像。這四座雕像分別為陳寶倉（1900-1950）、朱諶之、吳石、聶曦（1917-1950），這些人被中共稱之為「烈士」。依照毛人鳳的報告，陳寶倉、聶曦等人的犯行，吳石皆「俱各供認不諱」。按照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所發佈《關於瞿秋白同志被捕問題的複查報告》，裡面對忠貞黨員是這樣定義：「一、沒有出賣黨和同志；二、沒有攻擊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三、沒有吹捧國民黨；四、沒有向敵人求饒，乞求不死的任何內容。」<sup>97</sup>顯然吳石違背了這些原則，也沒有如同中共所宣稱的，被捕後必須「堅持黨的立場，保持了革命節操，顯示了視死如歸、從容就義的英勇氣概」。<sup>98</sup>雖然吳石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認識程度如何還有待商榷。再者，吳石是否為一位共產黨員也有待考證，但不可否認的是，至少他在中共定義中是一位「起義」將領，死後更被追封為「烈士」。

不過吳石這樣的請求並沒有為他換來一線生機。蔣鼎文錯估了蔣中正對此案的態度，在「該犯等最後哀請將懺悔情形轉報」後，他向蔣中正求情，希望對吳石能從輕發落，以落實國民黨政府對「自首自新」份子寬宏的政策。蔣中正勃然大怒之餘，除駁回減輕對吳石的判刑外，更批示將此案審判

<sup>96</sup> 〈前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通匪叛國案破獲情形〉。

<sup>97</sup> 〈附：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瞿秋白同志被捕問題的複查報告〉（1980.9.15），收錄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研究室編，《紀律檢查工作文件選編：1978.12-1980》（北京：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研究室，1981），頁221。

<sup>98</sup> 王振川主編，《中國改革開放新時期年鑑》（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頁853。

人員：「蔣鼎文、韓德勤、劉詠堯審判不公，並為罪犯說情免刑，殊為不法之至，應即將該三員革除原職為要。」<sup>99</sup>

蔣中正的態度其實也能理解，他對於「自首自新」的中共特科領導人顧順章（1904-1935）就是痛恨至極，一旦發覺他有意回歸中共，便殺無赦。<sup>100</sup>何況背叛自己的是受長期信任，且官拜國軍中將的吳石。蔣中正除交由周至柔（1899-1986）繼續調查此案外，同時「不准」周至柔所提「以蔣（鼎文）顧問等情有可原，經呈請鈞座免議處分」的簽呈。1950年代國民黨在臺灣政權尚未完全穩固，對蔣鼎文懲處畢竟不宜過重，最後以「辦理公務不遵法定程序」僅「記過」懲罰。<sup>101</sup>吳石等人最終均處以死刑，罪名即是「吳石等犯，深受黨國培育，位列將校，意而喪心病狂與匪勾結，供給軍事情報，實屬罪大惡極，死有餘辜」。<sup>102</sup>不過這也顯示出，在當時軍事審判視為統帥權一部分的思維下，作為三軍統帥的蔣中正擁有軍事判決的最終核覆權，當然這也難免產生不少「冤案」、「錯案」。

## 五、「自首自新」投向三民主義？

在幾位省工委會的共產黨員陸續被捕後，國民黨政府為了展現「寬大政策」，給予了這些「自新」人員一線生機。尤其是蔡孝乾、陳澤民、洪幼樵以及張志忠這四位領導人，更是具有指標性意義。在政府的安排之下，他們四人聯合發表〈中共臺灣省工委會蔡孝乾陳澤民洪幼樵張志忠聯名告全省中共黨員書〉（以下簡稱〈告臺灣全省中共黨員書〉），裡面勸告「共匪尚未就捕之黨員，及幹部從速依照政府規定之自首報到辦法，向政府坦白自首，並交出一切組織關係，停止一切組織及工作之活動」。<sup>103</sup>在〈告臺灣全省中共黨員書〉中，由蔡孝乾起草大綱，洪幼樵執筆，內容綱要主要談論省工委

<sup>99</sup> 國防部軍法局，〈周至柔呈蔣中正關於吳石案的裁示〉（1950.8.29），《吳石等叛亂案》，檔號：B3750347701/0039/3132034/34/1/006，檔案管理局藏。

<sup>100</sup> 參閱林威杰，〈顧順章「自新」與「中統」的發展〉，《國史館館刊》，68（臺北，2021.6），頁95-139。

<sup>101</sup> 〈周至柔呈蔣中正關於吳石案的裁示〉。

<sup>102</sup> 〈吳石等人案〉（1950年2月18日偵破），收錄李宜鋒等主編，《臺灣地區戒嚴時期五〇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二）——個案資料》，頁143。

<sup>103</sup> 〈共匪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秘密組織破獲經過〉。

會從成立到組織被破壞過程，以及檢討為何失敗等原因。<sup>104</sup>在四人聯合聲明中提到：

由於目前臺灣社會的安定，人民生活的向上，與大陸解放區人民生活成為很明顯的對照，使臺灣同胞對政府的信望提高，更由於臺灣同胞具有異族統治的慘痛經驗，對中共中央「一面倒」的國際政策萬分厭惡，使我們代表中共在臺灣工作的整個組織處於絕境。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先後被國防部保密局逮捕了。<sup>105</sup>

蔡孝乾等人將在臺灣失敗的原因歸咎於中共的「一面倒」政策，同時又分析因為臺灣人受到日本長時期的統治，缺乏革命的磨練，一般人民奉公守法，加上交通便利，使得國民黨政府能掌握社會每一個地方，經濟方面又因為實施土地改革，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在組織上，未能深入底層，群眾基礎薄弱，雖說積極的發展城市知識青年，但在廣大農村工作執行上卻甚為乏力，導致在策略的執行上發生客觀上困難。這些都是難以在臺灣發展活動的因素。

誠如上述原因，又因為國民黨政府對於「自首自新」份子「寬大」的方針，蔡孝乾等人在「各種錯誤與缺失檢討之後，我們捫心自問，深感咎責之重，特在此作沉痛的反省，以謝臺灣同胞於萬一」，並作出宣示：「自今日起，中共臺灣省工委與全省黨的組織已無存在的必要與可能，即正式宣佈解散。」<sup>106</sup>至於對那些仍潛伏在各地的中共黨員，則發出如此呼籲：

我們四人現在明瞭政府當局的意旨，認識寬大方針的真相，願最後以臺灣省工委的資格，對全省中共黨員進一步忠告，希望大家立刻依照政府規定的自首辦法，自動交出一切組織關係，以迅速終結整個案件，而澄清臺灣的社會局面。我們是最誠懇的熱忱等待著。<sup>107</sup>

<sup>104</sup>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蔡孝乾自新文告〉（1950.5.1），《蔡孝乾案》，檔號：A305050000C/0036/0410.9/44904440/4/001，檔案管理局藏。

<sup>105</sup> 〈中共臺灣省工委會蔡孝乾陳澤民洪幼樵張志忠聯名告全省中共黨員書〉（1950.5.12），《蔣經國總統文物》，「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內文件（一）」，數位典藏號：005-010100-00050-007，國史館藏。

<sup>106</sup> 〈中共臺灣省工委會蔡孝乾陳澤民洪幼樵張志忠聯名告全省中共黨員書〉。

<sup>107</sup> 〈中共臺灣省工委會蔡孝乾陳澤民洪幼樵張志忠聯名告全省中共黨員書〉。

為了讓那些「在臺灣加入中共組織而尚未被捕者」放心，宣示凡是在〈臺灣中共黨員自首報到辦法〉公布兩週內，向國民黨政府「自首自新」，則保證「不予逮捕」，且需宣示：「余誓以誠接受中央政府勸導，脫離中國共產黨之組織，坦白自首交出一切組織關係，並停止一切組織及工作之活動。如有故違，願受政府最嚴厲之處分。」<sup>108</sup>蔡孝乾以自己為例，勸告那些仍潛伏的中共黨員出來「自首自新」，他說：

以本人來說，我曾負全臺匪幫領導之責，罪尤可誅；然政府並不究既往，寬大為懷，而予以新生自贖之機會，生活上待遇上優厚，並給予適當的工作，勝任愉快。我很感謝政府對我的寬宥，並感謝曾經鼓勵我自首的親戚和朋友。<sup>109</sup>

最後呼籲那些「還在徬徨中的匪諜及赴匪份子，勿再執迷，勿再疑慮，迅速把握機會，立即遵照政府所公布的『自首辦法』，並向政府所指示的地點，投報自首，走向光明」。<sup>110</sup>至於這份聲明是否能代表四人真實意願值得探討，畢竟這是被捕後所作出的政治表態，宣示意義往往大於真實意涵。

國民黨政府在「自首自新」的問題上，宣稱秉持著「把寬大的尺度，放鬆到仁至義盡的地步。把防護網的密度，佈署到絲毫不漏的地步。」在做法上則用「所有政府的諾言，做到百分之百的兌現，所有預定的計畫，要求百分之百的貫徹」態度處理。這讓蔡孝乾感到：「對於政府這種以德服人，以誠感人的德意，表示忠心的感謝。」<sup>111</sup>倘若自首者能免於罪，尚屬佳話，「但事實上絕非如其所言，而真正免人於罪。即凡自首者，亦須入獄。至何時出獄？如何方能出獄？誰也不知道。」這讓隱藏在各地的共產黨人非常躊躇，但因為臺灣地方太小，躲藏不易，不少人冒著姑且一試心態，「雖明知自首不免坐牢，亦不能不自首」。<sup>112</sup>一些自首的共產黨人認為：「我若有什麼心結應向政府辦理自首以維安全。我覺得那是不可思議的事，要辦自首要

<sup>108</sup> 〈臺灣中共黨員自首報到辦法〉（1950.5.12），《蔣經國總統文物》，「國防部總政治部任內文件（一）」，數位典藏號：005-010100-00050-007，國史館藏。

<sup>109</sup> 〈蔡孝乾〉，《總統府人事登記卷》，入藏登錄號：129000105365A，國史館藏。

<sup>110</sup> 〈蔡孝乾〉，《總統府人事登記卷》。

<sup>111</sup> 張大山主編，《另一個戰場的勝利》，頁158、1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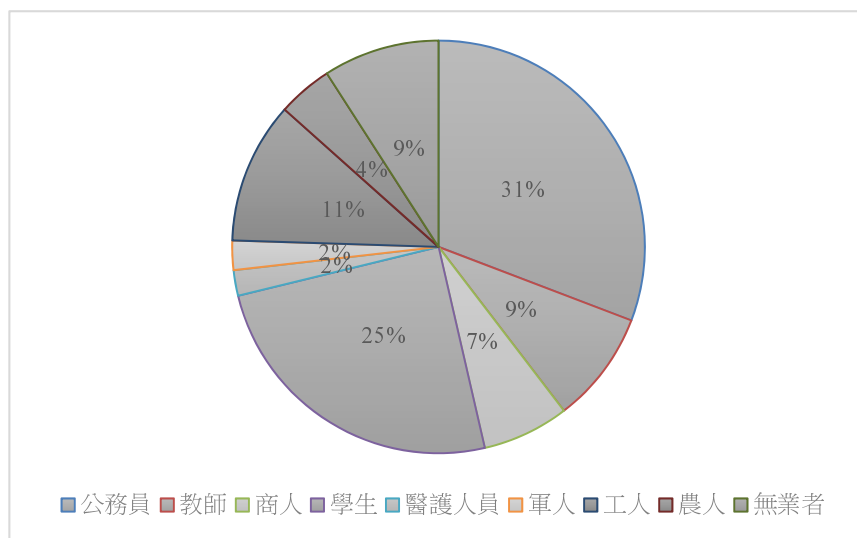
<sup>112</sup> 龔德柏，〈蔣介石黑獄親歷記〉，收錄李敖，《白色恐怖述奇》，頁269-270。

把所知經過都全盤抖出來，不然若被認為不坦白或有保留，自首會無效，反而等於自找麻煩地告訴他們秘密，成為他們處刑的藉口。」<sup>113</sup>

在蔡孝乾等人的「自新宣言」中，提出了省工委會失敗的主、客觀事實。整體來說，省工委會的失敗大致可以由三個面向去探討：（一）黨員結構；（二）國際局勢；（三）領導人素質。

### （一）黨員結構

截至1950年5月為止，省工委會共發展黨員900餘名，而遭保密局捕獲者僅351名，這顯示仍有大批份子在外潛逃。<sup>114</sup>從被捕共產黨員的省級結構來看，臺灣本省籍占89%，外省籍則有11%，「幹部多為外省籍，而黨員多係本省籍，共匪顯係派遣幹部來臺專對臺胞煽惑」。在黨齡部分上，入黨不滿五年者為97.7%，不滿兩年者更是高達78%。<sup>115</sup>至於黨員職業分布方面，如下圖2：



資料來源：〈共匪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秘密組織破獲經過〉。

圖2 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黨員職業分布圖

<sup>113</sup>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上冊，頁31。

<sup>114</sup> 〈中共臺灣省工委會蔡孝乾陳澤民洪幼樵張志忠聯名告全省中共黨員書〉、〈共匪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秘密組織破獲經過〉（1950.5.12），《蔣經國總統文物》，「國防部總政治部任內文件（一）」，數位典藏號：005-010100-00050-007，國史館藏。

<sup>115</sup> 〈共匪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秘密組織破獲經過〉。關於省工委會臺籍共產黨員研究，可參閱林正慧，〈1950年代左翼政治案件探討——以省工委會及臺盟相關案件為中心〉，頁395-477。

根據上述分析，省工委會黨員結構仍主要集中在知識份子與社會精英層，對於底層群眾發展仍有局限。再者，這批加入中共的黨員，多半是蔡孝乾等人來臺後發展，根據保密局統計資料顯示：

此次捕獲匪犯中以黨齡統計：二年以下者占百分之七十八人；三年以下者百分之十點七人；四年以下者百分之七人；五年以下者百分之二人；九年以上，十四年以下者百分之二人；二十五年者百分之零點三人（即蔡孝乾）。由此可知因過去兩年來，共匪聲勢之浩大，加入共產黨者亦較多。換言之，共匪黨員並非因信仰共產主義，而加入共黨，其入黨動機多半為政治上之投機。<sup>116</sup>

蔡孝乾主要吸收的是原先在日治時期的老臺共，其次為富商、地主等。照理說這些富商、地主並非所謂階級優良的共產黨員，他們對於共產主義的認同有待商榷。對此，谷正文也分析這些人加入共產黨的動機，認為他們「普遍目睹了日軍統治臺灣時，那些趁機配合的『先知者』是如何藉之成為富商地主、權傾一時的要人，因此，他們便急著要下定決心，在中共解放臺灣之前，搶先一步搭上這班飛黃騰達的特快車」。<sup>117</sup>相信有部分人如同谷正文所言，但這樣的說法，卻也忽略了二二八事件所帶給臺灣人民的傷害。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案的受刑人戴傳李（1926-2008）就曾說到：「我們加入共產黨並不完全是為了信仰馬克思主義，主要是對社會不滿所致。」<sup>118</sup>

美國中情局對此一現象則明確提出警告：「不同團體出於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從共產黨侵略中撈取各種好處的活動將會迅速蔓延開來。」中情局報告也指出，對國民黨政權威脅最大的潛在因素是，「如果國民黨官兵認為中國共產黨奪取臺灣的勝利迫在眉睫，其中許多人很容易陣前倒戈」，而中共確實也致力於滲透和策反臺灣政府官員。<sup>119</sup>尤其在中共建政後，對臺灣

<sup>116</sup> 〈共匪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秘密組織破獲經過〉。

<sup>117</sup> 谷正文，《國共地下鬥爭紀實：國民黨特務頭子回憶錄》，頁142-143。

<sup>118</sup> 黃克武訪問，〈戴傳李先生訪問紀錄〉（1998.4.15），《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第1輯，頁236。

<sup>119</sup> 〈中情局關於中國大陸的力量及其對臺灣的意圖〉（1951.4.10），收錄沈志華、楊奎松主編，《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4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8），頁174。



的組織與活動尤為積極。據蔡孝乾供稱，中共中央曾在1950年3、4月間傳來指示：

- (1) 幹部做深入隱蔽，充分利用地方性的關係，與廣大群眾結合起來；
- (2) 最大的任務是鞏固組織，不求發展，但在鞏固的基礎上，仍可發展組織；
- (3) 暴露或已發生危險的群眾要撤往香港；
- (4) 山地搞武裝充分利用合法的兩面派策略與群眾結合。<sup>120</sup>

這則指示被稱為「四月指示」，是由接替蔡孝乾領導省工委會的陳福星（1915-1985）宣布的，當時普遍認為這是中共中央華東局對省工委會最後一個指示。根據《歷年辦理匪案彙編》中所收錄的〈匪重整後「臺灣省委」組成「老洪」等叛亂案〉中便提到：「三十九年（1950年）五月，以陳福星中心之北部臺共組織已設法與匪共中央取得聯繫，接奉匪共中央一九五〇年四月指示，乃召集全省高級匪幹商討建立臨時領導機構，開始重整組織。」<sup>121</sup>不過曾永賢的回憶卻稱：「陳福星那時也對我們說是從華東局來的指示。然而，事後陳福星卻告訴我，『四月指示』真的確有其事，但不是來自華東局，而是出自於蔡孝乾的手筆。聲稱與華東局取得聯繫，只是為了振奮殘餘黨員的權宜之計。」<sup>122</sup>當時國民黨政府對臺灣已有相當的掌控，省工委會要與中共中央取得聯繫有一定的困難。況且這則指示是蔡孝乾第二次逃脫後在嘉義阿里山發出，因此陳福星後來的說法應該不無可能。

雖說「四月指示」能短暫振奮黨員，但由於現實環境的因素，省工委會在執行這些指示時遭受很大困難，故只能做到隱蔽幹部這一項，且大部分人員已撤往山區。省工委會分析要建立臺灣人民游擊武裝有以下五個困難點：

- (1) 臺灣地理上山區就食不易，平原活動困難；
- (2) 臺灣民間存槍絕無僅有；
- (3) 政府有充分的兵力防守主要城市及交通線，並可機動使用兵力；

<sup>120</sup>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蔡孝乾自白書及供詞〉。

<sup>121</sup> 〈匪重整後「臺灣省委」組織「老洪」等叛亂案〉（1951.4-1952.4偵破），收錄國家安全局編，《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2輯，頁204-205。

<sup>122</sup> 曾永賢口述，《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問錄》，頁98。

- (4) 保甲組織嚴密；
- (5) 高山族的爭取尚待開發。<sup>124</sup>

省工委會在建立武裝工作的議題上，「那真是笑話了，就是每人拿一把手槍，跑到山上搭棚子就要建立武裝基地，既沒有群眾，也沒有很好的地理形勢。臺灣的地理根本不容許武裝基地長期存在」。游擊戰爭是中國共產黨革命致勝的重要策略，也正因為如此，中共不斷強調要建立武裝根據地，這就讓曾永賢抱怨稱：「華東局指示要逐步開展游擊戰爭，真是瞎指揮！臺灣根本沒有開展武裝鬥爭的條件。」<sup>125</sup>正由於臺灣地理環境的特殊，讓國民黨能有效且快速的掌控社會每一個角落。海島的地形，缺乏戰略縱深，也扼殺了建立武裝根據地的可能。

重整後的省工委會則是鑒於蔡孝乾被捕後，「敵人繼續地對我進攻」，迫使剩餘組織轉入地下，發展上也從「偏於數量」的方式，轉變為「偏於質量」。截至1950年底，省工委會逐漸站穩腳跟後，開始為之前的挫敗作出檢討，發出《一九五〇年工作總結》，重新展開活動，「進行真正深入隱蔽的群眾工作，保存幹部，累積力量」，<sup>126</sup>具體工作方針如下：

- (1) 加緊幹部的思想教育（強調理論學習，使其與實際統一起來）。
- (2) 檢討過去的群眾工作，進一步的研究群眾工作。
- (3) 為著要使盲目的被動的工作提高到自覺的自動的程度而強調調查研究的必要。<sup>127</sup>

在工作報告提到，國民黨政府由上半年的「瘋狂的進攻轉變為威脅、欺騙並用的方式」，再由下半年的「亂點進攻——欠少計畫、步驟的——轉變有計畫有步驟的進攻」，「國民黨集中力量進攻我們，作最後的掙紮〔扎〕的時候，我們為著真正保存革命的力量」。在如此艱困的環境之下，「要防止不應有的犧牲起見，只有採取擴大影響的方針，無須組織，群眾教育當中，須

<sup>124</sup> 國防部保密局印，《搜獲共匪臺灣省工作委員會重要秘密文件之四：怎樣建立臺灣人民的游擊武裝》，頁1。

<sup>125</sup> 曾永賢口述，《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問錄》，頁84、86。

<sup>126</sup> 臺共省委，《臺共省委1950年工作總結》，檔號：257.4/7451/65908，法務部調查局藏。

<sup>127</sup> 臺共省委，《臺共省委1950年工作總結》。

要真正行群眾路線，以免突出」。<sup>128</sup>這讓省工委會在黨員的篩選與要求上，重視思想教育，藉此加強黨員的忠誠度。

不過臺灣受到日本統治 50 年，社會在殖民政府的嚴密控制之下，相較於中國大陸相對穩定。再者，臺灣在二二八事件後，國民黨加強輿論的控管，使底層民眾對政治有所忌憚。這些因素都讓省工委會工作進展產生一定的困難。1950 年 7 月，美國中情局對於臺灣局勢也作了這樣的分析：

臺灣（本地）人的力量和中共因素在臺都很微弱；因為在過去的歲月中，他們和以其他任何方式反對中國國民黨政府的團體都遭到了殘酷的鎮壓。儘管面對這些措施，大陸的中國共產黨人還是堅持派遣間諜，並將他們所需的設備和宣傳資料運往臺灣。如果發生對臺灣的全面襲擊，在必要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人控制的「第五縱隊」將可能迅速浮出水面，有效地滲透到臺灣一些重要的國防基地和聯絡中樞去。在中國共產黨人發動進攻之初，特別是受到成功建立立足點的鼓舞，國民黨人的防禦部隊和國民都有可能準備「陣前倒戈」。<sup>129</sup>

「陣前倒戈」一直是蔣中正內心的疙瘩，在戡亂戰爭中，國軍內部出現不少的「起義」或「投誠」將領，進而導致戰局逆轉。再者，臺灣在面臨「解放」的威脅之下，「通過嚴格的監督和嚴酷的手段，中華民國政府採取很多方法防止中共顛覆臺灣」。<sup>130</sup>

## （二）國際局勢

1950 年 6 月 25 日韓戰爆發，美國重新檢討了亞太政策。6 月 27 日，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 1884-1972）發表了「臺灣海峽中立化」宣言，因為他明白「除非美國海軍力量進駐臺灣水域，否則中國共產黨人的軍隊有能力儘早對臺灣發動攻擊」。況且在中共的認知中「解放臺灣」是完成中國統

<sup>128</sup> 臺共省委，《臺共省委 1950 年工作總結》。

<sup>129</sup> 〈中情局關於中國共產黨人與國民黨人對臺灣的意圖和能力的分析〉（1950.7.27），收錄沈志華、楊奎松主編，《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 4 卷，頁 154。

<sup>130</sup> 〈中情局關於中國大陸的力量及其對臺灣意圖的評估〉（1951.4.10），收錄沈志華、楊奎松主編，《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 4 卷，頁 174。

一的最後一塊拼圖，毛澤東瞭解到「只要臺灣一天不在中國共產黨人的掌控中，北平就會在國內外喪失一些政治聲望」。<sup>131</sup>但隨著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巡航臺灣海峽，穩固了臺灣島內政局，卻也讓「統一中國」進程延遲，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空軍力量未曾上過戰場，其海軍力量也沒有強大到與美國第七艦隊抗衡的程度」。<sup>132</sup>更重要的是，「只要美軍駐紮在福爾薩和中國大陸之間，攻擊福爾薩就要冒與美國開戰的風險，中共領導人不願意危害已經取得的人民的廣泛支持，損害在國內取得的成就，影響很多內部計劃」。<sup>133</sup>美國國務院也作出這樣的分析：「中共領導人也一定會清醒地意識到他們的困難，在美國有可能採取軍事行動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人要想鞏固勝利成果必然十分困難。」<sup>134</sup>加上「中國國民黨人極好地控制住了中共對臺灣的顛覆活動，且有力量保持這種控制」。<sup>135</sup>爾後隨著韓戰的停戰，冷戰對峙的局面逐漸形成，臺灣的地理區位優勢，讓美國加強與國民黨政府的關係，而這無疑給了蔣中正一劑強心針。

1952年4月，由郭潛（1909-1984）率領調查局更一舉破獲了中共在臺的地下組織，是為「重整後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案」，這讓「臺灣的共產主義活動已被成功鎮壓，除非島內顛覆活動有共產黨對臺灣入侵的配合，否則不會嚴重影響國民黨的軍事能力」。<sup>136</sup>在「重整後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案」後，「對臺灣地下黨有很大的打擊，往後除了個別逃跑的人之外，就沒有什麼組織性的活動了。從此以後在臺灣的地下黨，事實上已經不存在了，臺灣的共產運動也劃下了休止符」。<sup>137</sup>

<sup>131</sup> 〈國務院關於中國大陸攻佔臺灣的可能性的分析〉（1950.7.26），收錄沈志華、楊奎松主編，《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4卷，頁149-150。

<sup>132</sup> 〈國務院關情報研究所關於影響中國大陸進攻臺因素的分析〉（1950.9.11），收錄沈志華、楊奎松主編，《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4卷，頁159。

<sup>133</sup> 〈中情局關於中國大陸進攻臺灣的『威脅』的分析〉（1950.10.12），收錄沈志華、楊奎松主編，《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4卷，頁168。

<sup>134</sup> 〈國務院關情報研究所關於影響中國大陸進攻臺因素的分析〉（1950.9.11），收錄沈志華、楊奎松主編，《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4卷，頁157。

<sup>135</sup> 〈中情局關於1952年中國大陸的力量及其對臺灣意圖的評估〉（1952.4），收錄沈志華、楊奎松主編，《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4卷，頁184。

<sup>136</sup> 〈中情局關於臺灣國民黨政權今後實際反攻能力及對美國助國民黨反攻大陸計劃的可能反應之評估〉（1952.6.12以後），收錄沈志華、楊奎松主編，《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4卷，頁193。

<sup>137</sup> 曾永賢口述，《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問錄》，頁108。

### （三）領導人素質

從蔡孝乾過往的歷史來看，他在 14 歲加入共產黨，便開始革命旅途。對於一位十來歲的年輕人是否真的理解與認同馬克思主義值得商榷。從蔡孝乾論著中不難發現，他對於社會現實有著自己的理想與抱負，但這樣的理念如果危及生命安全時，仍以保命為首要目標。例如蔡孝乾曾在臺共陷入危機之時，離開臺灣逃至漳州。又如，他在紅軍遭到國軍圍剿時拋妻棄子，跟隨大部隊轉移。再者，雖中共中央曾給予省工委會極大的期望，但實際上蔡孝乾已離臺多年，人事已非，使得省工委會發展遇到瓶頸，「迄臺省工委會破獲時止，其電臺尚未建立」，這造成情報傳遞上的困難。加上，雖有謝雪紅及張志忠兩支武裝部隊，「而軍事幹部缺乏，部隊未經政治教育，工農群眾毫無戰鬥經驗，均屬失敗之主要因素」。<sup>138</sup>

蔡孝乾感情世界的豐富也是值得討論。蔡孝乾在第二次之所以被捕，主要原因是「蔡非要從阿里山下來去接他小姨子（我們叫她小馬，蔡與他小姨子有曖昧關係，蔡的妻子因此和蔡分手，返回大陸老家），結果蔡再次被捕。」<sup>139</sup>蔡孝乾被捕後，又一再要求能與馬雯鵬一同生活，這也讓他在個人道德上一直為人所詬病。

總述以上原因，在審時度勢後，蔡孝乾會選擇「轉變」，就不顯意外了。谷正文曾對這四位省工委會領導人提出這樣的評語：「在我與這些人的交手經驗裡，蔡孝乾的人品最令我不滿；而張志忠後來雖然被判死刑，但我對他評價卻最高；至於洪幼樵則是一個溫和的書生；而原籍廈門的陳澤民，則給我深刻的好印象。」<sup>140</sup>確實，張志忠是四位裡面唯一被處死的領導人，他於 1954 年 3 月 16 日被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罪名，遭到「實行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其家屬必需生活費用外，沒收之」。<sup>141</sup>

<sup>138</sup> 〈匪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叛亂案〉（1949.10.31 -1950.2.16 偵破），收錄李宣鋒等主編，《臺灣地區戒嚴時期五〇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二）——個案資料》，頁60-61。

<sup>139</sup> 徐博東，〈沈痛悼念中共臺灣隱蔽戰線的「活字典」徐懋德老伯〉，中國臺灣網，[http://www.taiwan.cn/plzhx/zjhzh/zhlw/201802/t20180228\\_11928541.htm](http://www.taiwan.cn/plzhx/zjhzh/zhlw/201802/t20180228_11928541.htm)（2021/1/25 點閱）。

<sup>140</sup> 谷正文，《國共地下鬥爭紀實：國民黨特務頭子回憶錄》，頁138。

<sup>141</sup>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張志忠叛亂一案判決〉（1953.10.29），《蔡孝乾案》，檔號：A305050000C/0036/0410.9/44904440/4/006，檔案管理局藏。

張志忠被捕後，在意識形態上並不像蔡孝乾那般有著直接轉變，而是讓國民黨政府感到其「思想受匪黨毒素太深，竟對政府仍做敵對仇視」，「態度仍甚頑強，影響其他人犯之情緒，須有個別房舍，始可看管」。<sup>142</sup>儘管他曾參與署名《告臺灣全省中共黨員書》，但這是否出於自願，則有待商榷。根據龔德柏的回憶：

保密局的非刑，除老虎凳、坐飛機外，還有火刑。即把火在犯人身上燒，燒過還不招供，則把火放入口中。據說臺共四大首領之一張志忠，曾受過此行。張於四十三年5月間，在桃園監獄同我住過數天，惜當時忘記向張證明此事，殊為遺憾。<sup>143</sup>

同時保密局也對張志忠妻子季澐（1921-1950）用刑，「經拷打後，其妻亦不肯吐實。乃向季澐示威：你若不吐實情，我們打你的兒子，因季澐帶有三歲之子入獄，恐其子受刑，故交出若干重要人物，而全案破獲。」<sup>144</sup>另據國民黨情治單位的材料顯示，省工委會山地工作委員會書記簡吉（1905-1950）係由「共匪『臺省工委會武工部長』張志忠提供線索」而遭到逮捕。<sup>145</sup>關於這一點，曾追隨張志忠活動的中共地下黨員吳克泰（1925-2004）認為這是國民黨「污蔑張志忠烈士」的手法，他稱：「張志忠看見有人關進來就大聲叫喊：『早說早死、晚說晚死、不說不死！』（張志忠同志的這三句話在臺灣左派中流傳至今）他經常喊口號、唱革命歌曲來鼓舞大家。獄吏對他又怕又尊敬，說他是共產黨裡真正的硬骨頭，好樣的。」<sup>146</sup>張志忠獄友陳其昌（1905-1999）也回憶：「當時，我看到，張志忠每天一早起來，總是如常地唱著《赤旗歌》或《國際歌》來鼓舞其他難友；並且仍然安靜地閱讀獄中只

<sup>142</sup> 國防部保密局，〈呈報本組在押犯匪楊春霖乙名態度蠻橫請鑒核由〉（1952.4.27），《蔡孝乾案》，檔號：A305050000C/0036/0410.9/44904440/1/042，檔案管理局藏；國防部保密局，〈張志忠移監事宜〉（1953.4.27），《蔡孝乾案》，檔號：A305050000C/0036/0410.9/44904440/4/002，檔案管理局藏。

<sup>143</sup> 龔德柏，〈蔣介石黑獄親歷記〉，收錄李敖，《白色恐怖述奇》，頁222。

<sup>144</sup> 龔德柏，〈蔣介石黑獄親歷記〉，收錄李敖，《白色恐怖述奇》，頁220。

<sup>145</sup> 〈匪山地工作委員會簡吉等叛亂案〉（1950.4.25偵破），收錄國家安全局編，《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2輯，頁72。

<sup>146</sup> 吳克泰，〈隱蔽戰線的傳奇英雄——張志忠烈士〉，《軍事歷史》，2（北京，2002.3），頁61-62。

能看到的共產主義批判之類的書。因為張志忠曾經告訴我說：『我每天等著他們來槍斃我！』」<sup>147</sup>國民黨政府也曾試圖感化張志忠，但他不僅「詆毀元首」更對保密局「大肆謾罵」，「態度更加蠻橫繼稱『我是你們保密局的敵人，不需要你們的優待。』」<sup>148</sup>而這或許表現出共產黨人所宣稱，那種面對生死時的無畏精神？

張志忠曾指著蔡孝乾破口大罵：「今天我們要是被槍斃了，全是你害的。」同時也數落了蔡孝乾「如何誘姦十四歲的小姨子，如何侵吞一萬美金的經費，如何四處炫耀其共黨負責人的身分，以及生活是如何的糜爛」。另外，也隨著蔡孝乾所提供的線索，被捕的共產黨人越來越多，使得「他所面臨的責難就越來越多了。囚室內只要聽見老蔡的聲音，就會被大吼著：『你不要再害人了，你吃好一點的，就又要死人囉！』」<sup>149</sup>

在省工委會幾位領導人裡，只有蔡孝乾是「說服後供述」，其餘絕大部分人是「與有關匪犯質詢後供出」，許多人最終仍不服從國民黨，而遭到處死。<sup>150</sup>一開始有不少人認為只要「自首自新」，政府必定寬大為懷，「以為國民黨對於所捕地下組織份子不會對待得太嚴苛，至少不會以殺戮對待。因此錯覺才毫無忌憚地供出一切有關組織成員與所知道的一切情報」。不過事與願違，「政府不實現諾言，要抓的人抓了，順利取得已被抓而關在裡面的人的口述之後卻是大肆殺戮或投獄，導致被捕殺者達數千名、被長期監禁者達數萬人之大浩劫」。由於蔡孝乾被國民黨當局「騙得團團轉」，他非但沒有「寧死不能告密」，反而是將一切所知道的供出。<sup>151</sup>看著過往的同志一一被逮捕，手上沾滿了共產黨人的鮮血，這也讓蔡孝乾產生了恐懼與不安。據谷正文回憶稱：

漸漸地，老蔡變得沉默了，每天只拼命照我拿給他的自白書大綱寫著，一直到我覺得他精神恍惚時，這些手稿竟堆了有半人高。

<sup>147</sup> 藍博洲，《臺共黨人的悲歌——張志忠、季滯與楊揚》，頁359-360。

<sup>148</sup> 國防部保密局，〈呈報本組在押犯匪楊春霖乙名態度蠻橫請鑒核由〉。

<sup>149</sup> 谷正文，《國共地下鬥爭紀實：國民黨特務頭子回憶錄》，頁139-140。

<sup>150</sup> 〈共匪臺灣省工委會案偵查報告表〉（1952.9.23），《蔡孝乾案》，檔號：A305050000C/0036/0410.9/44904440/1/001，檔案管理局藏。

<sup>151</sup>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上冊，頁78-79。

他還是不愛說話，其他的幹部也發現老蔡有問題，我只得把狗頭醫官王勉找來同老蔡談一談，結果證實他的精神狀態確實有問題。「老蔡是神經病！」王勉說。<sup>152</sup>

最終在一連串高強度的審訊之下，導致「在押人犯蔡孝乾一名突於本（九）月十七日晨四時患染神經病」。他隨即便被送往臺大醫院治療，「並於馬犯雯鵬陪同前往隨身服侍蔡犯」。<sup>153</sup>蔡孝乾在臺大醫院住院7個月左右，期間他不時「胡言亂語」，保密局也派人24小時監視，同時將每天住院日報表上呈。<sup>154</sup>

至於蔡孝乾是否真的罹患所謂神經病，谷正文一直持有保留態度，他曾對蔡提到：「你這病是真是假？如果是假的，那就回去吧；如果是真的，那也得有些事做啊！總不能老閒著。」<sup>155</sup>關於蔡孝乾是否患病問題上，無論其真假，多少都能理解。自從蔡孝乾被捕後，不少共產黨人因為他的關係遭到逮補，許多人最終難逃一死。這些人是蔡孝乾過去的戰友、同志，如今卻因他而死，想必內心承受無比的壓力與罪惡感。再者，蔡孝乾也擔心如果哪一天他沒有利用價值了，會不會也像那些遇害的共產黨人？「裝瘋賣傻」，似乎就成為他可以活下來的一線生機。這或許能從蔡孝乾在臺大醫院治療一個月後，他與主治醫師對話中可以看出端倪：

我的案子早已結束了，但常常還要我看該案某某人是否此人，當我被問時，即感不太高興。從半年前精神已有點不愉快，書寫容易錯誤或遺忘，可能係入獄精神遭受刺激所致。他們（指本局以下同）於六、七月間對我講在外面修房子給我住，馬雯鵬也回來了。至九月十七日以後，我就沒有記憶了，當病發時像是感覺

<sup>152</sup> 谷正文，《國共地下鬥爭紀實：國民黨特務頭子回憶錄》，頁140。

<sup>153</sup> 國防部保密局，〈蔡孝乾患精神病〉（1952.9.24），《蔡孝乾案》，檔號：A305050000C/0036/0410.9/44904440/5/001，檔案管理局藏。

<sup>154</sup> 國防部保密局，〈蔡孝乾住院情形報告表〉（1952.10.15），《蔡孝乾案》，檔號：A305050000C/0036/0410.9/44904440/5/001，檔案管理局藏；谷正文，《國共地下鬥爭紀實：國民黨特務頭子回憶錄》，頁141。

<sup>155</sup> 谷正文，《國共地下鬥爭紀實：國民黨特務頭子回憶錄》，頁141。



世界已到末日，又想飛快從地獄裡跑出不行。<sup>156</sup>

蔡孝乾更將這幾個月心境，有系統的歸納為四項：

- (1) 對於死的恐怖：我的案子已經結束了，照著看起來隨時都有被「救」的可能；
- (2) 懷疑：他們說準〔准〕我出去和馬雯鵬住在一起，但對我態度還是照舊；
- (3) 對將來的恐怖：如果將來我能在外面生活，也怕我以前的組織的人來復仇；
- (4) 思想上的衝突：我對以前的主義已有很大的關係，也可以說有未斷的情感。現在想改（雖然他們並要我一定馬上信仰他們的主義）而做完全相反的事情，心裡就有很大的衝突。<sup>157</sup>

最後蔡孝乾提到：「現在我對於（1）（2）（3）項都沒有什麼懷疑，對於第（4）我漸漸的可以改變。對於將來我現在沒有什麼詳細計畫，他們並不一定要我去怎樣做，也不是要我去抓人，而是研究工作。」<sup>158</sup>

但上述所言，無論蔡孝乾是否真心誠意，不難看出他在信仰上仍有一定程度的堅持，要從一個馬克思主義的信徒，走向另一個在共產黨人眼中「階級敵人」信仰的主義，想必內心頗為難受才是。不過有一點值得討論，蔡孝乾是否真正瞭解與認同馬克思主義真諦，則有待商榷。再者，雖說蔡孝乾也曾經提到：「共產主義是不適合中國的，今日中國所必需的是三民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這或許是他在不得已狀況下，所作的政治宣示？<sup>159</sup>因為從清黨後，國民黨面對中共的「轉變」份子，都需要他們作出宣示來效忠三民主義，如顧順章、徐錫根（1903-?）、羅章龍（1896-1995）乃至張國燾（1897-1979）等人皆然，宣稱這些人「摔掉了偽共黨的沉重的枷鎖，走向光明的三民主義的康莊大道。這一切便是象徵了他們已經找着了革命的真

<sup>156</sup> 國防部保密局，〈蔡孝乾與主治醫師交談紀錄〉（1952.10.15），《蔡孝乾案》，檔號：A305050000C/0036/0410.9/44904440/5/001，檔案管理局藏。

<sup>157</sup> 國防部保密局，〈蔡孝乾與主治醫師交談紀錄〉。

<sup>158</sup> 國防部保密局，〈蔡孝乾與主治醫師交談紀錄〉。

<sup>159</sup> 〈蔡孝乾〉，《總統府人事登記卷》。

理」。<sup>160</sup>

由於省工委會發展過於躁進，在入黨要求上沒有嚴謹的篩選，雖說黨員數在二二八事件後快速增長，但人數成長不如預期，這些人「黨性」是否堅強值得探討，「共匪各級組織基礎與忠實程度，均不夠堅強，一經破獲追捕，即行全面動搖，終至瓦解」。<sup>161</sup>雖說蔡孝乾的「叛變」是導致失敗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也不容忽視當時大環境對省工委會發展的影響。在冷戰的格局下，臺灣站上反共的橋頭堡。隨著省工委會的覆滅，使得臺灣的共產革命運動陷入低潮。

那麼，「轉變」後的蔡孝乾是否真的得到國民黨的信任呢？往後的日子裡，蔡孝乾任職國防部情報局，專門負責「匪情研究」工作，後升任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副局長領少將銜。情報局還為蔡孝乾在臺北市士林芝山岩附近置辦住宅，同時還與「馬雯鵬共築愛巢，產下愛情結晶——蔡艾安」。<sup>162</sup>在看似一帆風順之餘，其實國民黨當局仍對蔡孝乾不能完全放心。尤其長時間的與共產黨作鬥爭，因此在面對這些「自首自新」的「轉變」份子，國民黨有一套自己的策略：

- (1) 他們答應自首了，仍然不可放鬆教育工夫，尤其在被捕或在監獄中表示自首，難免不有幾分勉強成份。只有在自首後，加強教育工作，使他死心踏地悅服我們，才能切實把握住他；
- (2) 指定專人，隨時考察他，測驗他，發現有一點不妥馬上糾正他；
- (3) 經常注意他接近些什麼人，閱讀些什麼書籍，是不是在表面上應付我們，而「內心仍保持著自己的邪念」？
- (4) 實在不可救藥的人，用不著再對他們客氣；
- (5) 對於已經誠懇自首的人，應有適當的工作分配，並有計劃的考察和監督，使之在新的工作中，提高其工作情緒和堅定其對本黨的信

<sup>160</sup> 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轉變》(1933年12月)，檔號：245.3/841/14824，法務部調查局藏，頁44；統一出版社編印，《轉變》，第2輯(1941年)，檔號：245.3/842/9401c.1，法務部調查局藏，頁4-13。

<sup>161</sup> 〈匪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叛亂案〉(1949.10.31 -1950.2.16 偵破)，收錄李宣鋒等主編，《臺灣地區戒嚴時期五〇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二)——個案資料》，頁60。

<sup>162</sup> 李宣鋒、魏永竹訪問，〈當事人蔡孝乾家屬馬雯鵬暨蔡艾安訪問紀錄〉，收錄李宣鋒等主編，《臺灣地區戒嚴時期五〇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二)——個案資料》，頁63。

仰，離開工作後難使自首的人永遠忠誠本黨；

- (6) 對真誠自首的人，應以誠摯的態度對之，如對自己的同志一樣，並有對他們表示同情，千萬不要歧視他們。<sup>163</sup>

這些中共「叛徒」即便在「轉變」後，依然無法受到國民黨政府的重用與信任，而蔡孝乾自然也明白這個道理，所以為了活命他選擇裝瘋賣傻。再者，蔡孝乾跟顧順章一樣，手上沾滿了共產黨人的血，這樣的人難保哪天不會再「背叛」自己呢？因此，與其說是國民黨給蔡孝乾這些「自首自新」份子優待，倒不如說是就近監視，以防不測。

「自首自新」政策是國民黨用來招撫中共地下黨的重要策略，理論上只要願意「轉變」，投靠政府，便會依據個別狀況給予不同處置。這種處置大致可分為四種類型：第一類，「自新轉變」，供出一切訊息，或協助政府搜捕其餘共產黨員，如蔡孝乾、陳澤民、洪幼樵等人。此類人是政府用來宣傳寬大為懷政策的範本，他們必須發出「自新宣言」，效忠國民黨政府。他們受到政府「優待」，但往往也受到嚴密監控；第二類，「寧死不屈」的共產黨人，如張志忠、林英傑（1913-1950）<sup>164</sup>等人。這類人不願意投靠國民黨政府，但通常容易失去生命；第三類，「自新」坦白不澈底，這類人雖向國民黨政府「自首自新」，但並未完全交代一切訊息，如省工委會阿里山支部小組長李瑞東，他雖在規定時間內向政府自首，但卻未將私藏武器以及其餘黨員告知，而最終遭到處決；<sup>165</sup>第四類，國民黨內部「叛徒」，這類人以吳石為代表。蔣中正對於「自首自新」的共產黨人尚能接受，只要他們服從國民黨政權，接納三民主義，多半能獲得一線生機。但吳石不同，他是蔣中正信

<sup>163</sup> 中央調查統計局編，《中共關於自首問題對其黨人的指示和我們應採的對策》，檔號：245.301/7435c.5/09587，法務部調查局藏。

<sup>164</sup> 國防部軍務局，〈檢呈林君等案卷判可否提先執行〉（1950.7.12），《非法顛覆案》，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3/1111/7/061，檔案管理局藏。

<sup>165</sup> 李瑞東事件後，國民黨政府作出檢討，認為：「我方自首政策原為對匪鬥爭謀略運用之一。而李匪自首之動機，僅為解除其逃亡生活之痛苦，及避免被捕之威脅；絕非誠心悔悟。且希圖以假自首方式，矇騙政府，以遂行其隱蔽組織儲藏武器，而俟機蠢動之陰謀。」此案的偵破，被國民黨政府視為「尤具政治價值」。〈匪阿里山支部李瑞東自首不誠案〉（1952.2 偵破），收錄國家安全局編，《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2輯，頁328、331。

任的下屬，這樣的人背叛自己，是難以接受的。這也說明為何吳石就算願意「自新」，最終仍難逃一死。其實無論是那一類人，在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握有絕對的司法審判權，這些人的存亡往往在主政者的一念之間，「要你死，要你活，存於有此權柄的人的方寸之中」。<sup>166</sup>因此，共產黨人在當時是否真的有那麼十惡不赦？否則身為「匪首」的蔡孝乾也不會得以善終。

1958年2月25日至27日，當時已身為國防部少將參議的蔡孝乾，由臺北返回彰化花壇探親，除由第二特勤組上尉陳火土全程陪同外，「並由第六特勤組派員秘密跟監」。蔡孝乾返鄉期間，除了跟其叔父蔡維熊「有耳語交談外」，其他親友則主要談論自己「離臺後到大陸參加匪黨，再返臺灣工作至被捕，政府寬大處理」等內容。國防部「抽調同志七人，日夜輪班秘密跟監」，「無任何意外發生」，不過，「觀察其親戚對蔡同志很熱情，朋友均敬而遠之，並不十分歡迎」。<sup>167</sup>

雖說官拜國防部少將，實際上並無權力，因此蔡孝乾往後專注在中共問題的研究。從1960年開始，蔡孝乾開始在《匪情研究》雜誌上陸續發表有關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專題研究，在同年12月彙編成為《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1965年8月及9月間，中共為了紀念「八一建軍節」以及慶祝抗戰勝利二十週年之際，「狂吹其武裝叛亂的『暴力革命』，以及所謂『依靠農民，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佔領城市，奪取全國政權』的人民戰爭路線，可以埋葬資本主義，赤化人類世界。」因此，蔡孝乾鑒於「當時中共囂張情況，撰寫了幾篇有關毛共人民戰爭理論及其戰略戰術指導原則的專題研究」，也將這些文章彙編為《析論毛澤東人民戰爭》的小冊子。1971年則將兩本小冊子合編為《毛澤東軍事思想和人民戰爭之研究》一書，而這是蔡孝乾由紅轉白之後，所留下來的的一本重要著作。<sup>168</sup>1982年初，蔡孝乾罹患急病，一病不起，「以致沒有留下較為真實的歷史遺物」。<sup>169</sup>

<sup>166</sup>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上冊，頁79。

<sup>167</sup>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蔡孝乾返里探親跟監報告〉（1958.3.7），《蔡孝乾案》，檔號：A305050000C/0036/0410.9/44904440/2/027，檔案管理局藏。

<sup>168</sup> 蔡孝乾，〈弁言〉（1971.3.26），《毛澤東軍事思想和人民戰爭之研究》（臺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71），頁1-2。

<sup>169</sup> 李宣鋒、魏永竹訪問，〈當事人蔡孝乾家屬馬雯鵬暨蔡艾安訪問紀錄〉，收錄李宣鋒等主編，《臺灣地區戒嚴時期五〇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二）——個案資料》，頁63。

## 六、結語

綜觀蔡孝乾革命的軌跡，他出生於一個中產階級家庭，曾目睹臺灣社會的種種不合理，在既得利益者掌控之下，底層人民只能服從。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似乎只能投身革命，而這或許是誘發蔡孝乾走上共產革命的動機。確實，蔡孝乾在抗戰期間所表現出來的是一位民族主義者，他發揮自身的優勢，對日軍作深入的分析與研究，以供前線共軍參考。

抗日戰爭的勝利，倒也成為蔡孝乾人生的一個重大轉折，他受命返臺成立黨組織。此時的臺灣剛剛擺脫日本的殖民統治，但畢竟已與中國分離 50 年之久，加上接收臺灣的國民黨政府在施政上有許多爭議，如任用私人等裙帶關係等，貪污腐敗更在政府單位屢見不鮮，社會的動亂，讓「臺灣籍人憎恨國民黨的存在」。<sup>170</sup>在這個背景之下，使得省工委會有了活動空間。二二八事件打破不少人對國民黨政權原先的想法，省工委會便利用部分民眾對國民黨的仇恨，積極的發展組織，讓不少臺灣人踏上共產革命的道路。不過，隨著中華民國政府在戡亂戰爭中的逐步失利，國民黨加強了對臺灣的控制。加上 1950 年初蔡孝乾的被捕入獄，並隨即「叛變」，打亂了中共「解放」臺灣的計畫。

蔡孝乾是國共勢力發生根本性逆轉後，「叛變」的一位重要共產黨人。1949 年中共的建政，中華民國中央政府轉進臺灣。中共曾寄望利用在臺組織，策反國民黨高層，配合解放軍由內而外「解放」臺灣，但畢竟撤退來臺的人士，在本質上與在中國大陸時期有所區別。這些人基本上為反共份子，更重要的是已經無可再撤，只剩臺灣一隅，生死攸關之下，忠誠度相對較高。蔡孝乾的被捕「叛變」，導致中共在臺組織受到嚴重打擊，加上韓戰的爆發，使得國民黨進一步掌控臺灣，進而導致今日兩岸關係的形成。再者，臺灣整體環境和條件與大陸不盡相同，因此無法將武裝割據的革命型態套用在臺灣。尤其在蔡孝乾「叛變」後，省工委會人員「死走逃亡傷」，在自顧不暇之際，這些僅存的黨員還能有多少影響力呢？此外，黨員篩選上並不嚴

---

<sup>170</sup> 〈中情局關於臺灣國民黨政權今後實際反攻能力及對美國助國民黨反攻大陸計劃的可能反應之評估〉（1952年6月12日以後），收錄沈志華、楊奎松主編，《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4卷，頁193。

謹，部分人或許有著搭便車的心態，希望趁著中共勝利的餘威，來獲取未來的政治利益。不過也不能全然責怪他們，畢竟省工委會領導人自己也多半抱著臺灣即將「解放」的心態。

人在面臨危難之機，往往更能展現最真實的內心。因為蔡孝乾案的關係，進而牽連一千人等，這批人因為入黨時間短暫，很難將他們定義為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在主義與生存之間，許多人選擇了生存。這也不能責怪這些人，因為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之下，相信不少人難以承受嚴刑拷打。陳英泰就曾回憶：「若認為非逼出口供不可，問案所用的花樣就會很多，最主要拷問的手段有老虎凳、拔指甲、指甲穿鐵線、用牙刷擦女人陰部，再加上日以繼夜不讓睡覺照射強烈燈光的疲勞轟炸式詢問，真是五花八門。」<sup>171</sup>當然仍有不少人如張志忠、計梅真或林英傑那般，放棄這種生存，寧願選擇死亡。<sup>172</sup>

---

<sup>171</sup>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上冊，頁77。

<sup>172</sup> 顏世鴻，《青島東路三號：我的百年之憶及臺灣的荒謬年代》，頁211。

## 引用書目

### 一、文獻史料

#### (一) 檔案

##### 1、臺北，國史館藏

《蔡孝乾先生傳略》

《總統府人事登記卷》，〈蔡孝乾〉。

《蔣中正總統文物》，〈種種不法罪行（二）〉。

《蔣經國總統文物》，〈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內文件（一）〉。

《教育部》，〈私立上海大學畢業生等〉。

##### 2、新北，檔案管理局藏

《蔡孝乾案》

〈共匪臺灣省工委會案偵查報告表〉。

〈呈報本組在押犯匪楊春霖乙名態度蠻橫請鑒核由〉。

〈破獲共匪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組織系統表〉。

〈張志忠叛亂一案判決〉。

〈張志忠移監事宜〉。

〈馬雯鵬訊問紀錄〉。

〈蔡孝乾自白書及供詞〉。

〈蔡孝乾履歷書〉。

〈蔡孝乾返里探親跟監報告〉。

〈蔡孝乾自新文告〉。

〈蔡孝乾與主治醫師交談紀錄〉。

〈蔡孝乾患精神病〉。

〈蔡孝乾住院情形報告表〉。

《鍾浩東等叛亂》，〈鍾浩東等匪諜案卷〉。

《各縣市奸黨調查案》

《吳石等叛亂案》，〈周至柔呈蔣中正關於吳石案的裁示〉。

《非法顛覆案》，〈檢呈林君等案卷判可否提先執行〉。

### 3、新北，法務部調查局藏

中央調查統計局編，《中共關於自首問題對其黨人的指示和我們應採的對策》，檔號：245.301/7435 c.5/09587。

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轉變》（1933.12），檔號：245.3/841/14824。

內政部調查局編，《共匪的特務工作與保密工作》（1951.11），檔號：276/725/19121 c.4。

內政部調查局編，《臺灣地區對匪鬥爭工作總結》（1952），檔號：270.9/7135a/65904。

內政部調查局編，《臺灣之政治保衛工作》（1954），檔號：276/7135/64509。

內政部調查局編，《臺共叛亂史》（1955），檔號：232.223209/725/40541-5/c.1-5。

統一出版社編，《轉變》，第2輯（1941），檔號：245.3/842/9401 c.1。

臺共省委，《臺共省委1950年工作總結》，檔號：257.4/7451/65908。

閩粵贛邊省委編，《關於自首自新決定的通知》（1937.10.15），檔號：245.3/815/12626。

國防部保密局印，《搜獲共匪臺灣省工作委員會重要秘密文件之四：怎樣建立臺灣人民的游擊武裝》（1950.5），檔號：257.4/4155 ,c1/08281。

國防部保密局印，《搜獲共匪臺灣省工作委員會重要秘密文件之六：怎樣配合解放軍作戰》（1950.5），檔號：257.4/7451n.6；c.2/08286。

### （二）檔案、史料彙編

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研究室編，《紀律檢查工作文件選編：1978.12-1980》，北京：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研究室，1981。

中共問題原始資料編輯委員會，《中共的特務活動（中共原始資料彙編之三）》，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3。

石牌訓練班編印，《共匪特工的作法》。臺北：石牌訓練班，1957。



李宣鋒等主編，《臺灣地區戒嚴時期五〇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二）——個案資料》，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年。

沈志華、楊奎松主編，《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4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8。

胡健國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26輯，臺北縣：國史館，2003。

國家安全局編，《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1-3輯，臺北：國家安全局，1959-1961。

### （三）報紙

《解放日報》（延安），1947。

《臺灣民報》（臺北），1926。

### （四）口述、回憶錄、年譜、選集、文史資料

中華民國忠義同志會，《大略雄才——葉翔之先生百齡冥誕紀念集》，臺北：中華民國忠義同志會，2011。

王振川主編，《中國改革開放新時期年鑑》，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

列寧，《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吳仲禧，〈解放戰爭時期我與吳石的交往〉，《文史資料選輯》，第170輯，北京，2017.10，頁84-85。

呂芳上，黃克武，許雪姬等，《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第1-3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

谷正文，《國共地下鬥爭紀實：國民黨特務頭子回憶錄》，香港：東西文化事業公司，1996。

谷正文，《亂世蛇神：谷正文特務工作檔案》，香港：東西文化事業公司，1997。

谷正文口述，許俊榮、黃志明、公小穎整理，《白色恐怖秘密檔案》，臺北縣：獨家出版社，1995。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上、下冊，臺北：唐山出版社，

2005。

曾永賢口述，《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問錄》，臺北：國史館，2020。

蔡孝乾，《臺灣人的長征紀錄》，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2。

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楊翠華編，《我的半生記》，臺北：編者發行，2004。

顏世鴻，《青島東路三號：我的百年之憶及臺灣的荒謬年代》，臺北：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

## 二、近人專書

李敖，《白色恐怖述奇》，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1。

張大山主編，《另一個戰場的勝利》，臺北：中國新聞出版公司，1953。

張若彤，《究竟 228：林茂生之死與戰後臺灣反日力量的覆滅》，臺北：講台文化有限公司，2021。

楊奎松，《開卷有疑—中國現代史讀書札記》，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蔡孝乾，《毛澤東軍事思想和人民戰爭之研究》，臺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71。

盧修一，《日據時代臺灣共產黨史（1928~1932）》，臺北：前衛出版社，2004。

藍博洲，《臺共黨人的悲歌——張志忠、季滄與楊楊》，新北：臺灣人民出版社，2012。

## 三、近人論文

王漢威，〈戰後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的組織與運作〉，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王鍵，〈出席臺共成立大會的中共代表『彭榮』身分辨析〉，《北京社會科學》，4，北京，2013.7，頁 53-64。

吳克泰，〈隱蔽戰線的傳奇英雄——張志忠烈士〉，《軍事歷史》，2，北京，2002.3，頁 58-62。

- 杜繼東，〈紅白之變——蔡孝乾紅白人生研究之三〉，收錄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主編，《臺灣光復六十五週年暨抗戰史實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頁 37-57。
- 杜繼東，〈留學上海——蔡孝乾紅白人生研究之一〉，收錄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編，《林獻堂蔣渭水—臺灣歷史人物及其時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臺海出版社，2009，頁 698-723。
- 杜繼東，〈臺共風雲——蔡孝乾紅白人生研究之二〉，收錄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主編，《日據時期臺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頁 117-132。
- 沈安娜，〈教導勉勵永記在心——憶周恩來指導我做情報工作〉，《黨的文獻》，1，北京，1998.1，頁 40-44。
- 林正慧，〈1950 年代左翼政治案件探討——以省工委會及臺盟相關案件為中心〉，《臺灣文獻》，61：1（南投，2009.3），頁 395-477。
- 林邑軒，〈來自彼岸的紅色浪潮：從意義中介視角重構戰後初期「省工委」的地下革命行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 林威杰，〈顧順章「自新」與「中統」的發展〉，《國史館館刊》，68，臺北，2021.6，頁 95-139。
- 梁正杰，〈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相關政治案件之研究（1946-1961）〉，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 陳小冲，〈一個臺灣變節者的『革命』前史—蔡孝乾早期歷史探微〉，《臺灣研究集刊》，6，廈門，2017.12，頁 78-85。
- 陳永發，〈延安的「革命鴉片」毛澤東的秘密武器〉，《二十一世紀》，8 月號，香港，2018.8，頁 43-71。
- 黃道炫，〈刀尖上的舞蹈：弱平衡下的根據地生存〉，《抗日戰爭研究》，3，北京，2017.9，頁 4-22。
- 蔡西濱，〈中共地下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1946-1950）——以臺北市地區為研究中心」〉，新北，私立淡江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9。
- 蘇瑞鏘，〈戰後臺灣白色恐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26：3，臺北，2019.9，頁 139-180。

#### 四、網路資料

徐博東，〈沈痛悼念中共臺灣隱蔽戰線的「活字典」徐懋德老伯〉，中國臺灣網，[http://www.taiwan.cn/plzhx/zhjzhl/zhjlw/201802/t20180228\\_11928541.htm](http://www.taiwan.cn/plzhx/zhjzhl/zhjlw/201802/t20180228_11928541.htm)（2021/1/25 點閱）。

# The Communist's Chosen Path: Cai Xiaoqian's "Betrayal" or Surrender

Wei-Jie Lin\*

##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aiwan Provincial Working Committee had a bearing on the succ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in "liberating" Taiwan and accomplishing the "reunification" of China. Cai Xiaoqian, who had risen to a high position during the Jiangxi period of the CCP, was the only Taiwanese person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Long March". He was entrusted with an important post and served as the top leader of the Provincial Working Committee. However, after he was arrested by the Kuomintang in 1950, he paid no attention to the integrity education of the Yan'an era, surrendered immediately, and instead became a key figure assisting the Kuomintang in completely destroying the Taiwan underground party. Cai participated in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in Yan'an and knew the Party's loyalty education. Why had he "changed" so quickly after being arrested? These issues are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Key words:** The Taiwan Work Offi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ai Xiaoqian, Traitor, Surrender

---

\* Instructor,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Shanghai University